

序

《忆苦思甜話家史》出版了。这是一本生动的阶级教育的教材，值得人人一讀。

本书編入的九位老工人的“家史”，是对旧社会的一部控訴书。他們充滿血泪的历史，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鞭撻了剝削制度的罪恶。

看吧：

九个工人中，就有三十多个亲人被旧社会折磨致死。他們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打死，有的在沉重的劳动中累死，有的在疾病的煎熬中死去，有的被逼自杀，有的冻餓而死。张瑞元的六个孩子，一个一个地被夺去了生命，有的临死前嘴里还喊着“面湯”；张全有的女儿死前还喊“我餓”；曹桂凤的妹妹咽气以前还要餽餽……

九个工人中，就有十四个亲人被搶走、卖給人家、或者被迫改嫁，或者当了童养媳。王秀兰姐妹三个，都是在几岁和十几岁时就走进了“鉄籠子”，日夜受着折磨，吃的是連猪也不吃的“飯”……

九个工人中，几乎每家都发生过生离死别、骨肉分散的惨剧。

九个工人中，几乎家家都要过飯，在旧社会沒吃过一頓飽飯。

九个工人中，几乎家家沒有住处。他們在“破瓦寒窑”中，在破庙里，在烟囱旁边栖身。

九个工人中，沒有一个人上过学。

.....

数不尽的事实，讀起来真是一字一泪。他們的悲惨生活，不正是旧社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生活的縮影嗎？是誰逼得他們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九个老工人的“家史”用具体的事实告訴人們：是黑暗的旧社会，是罪恶的剝削制度。从国民党反动派到地主、资本家、日本鬼子和他們的爪牙汉奸、特务、伪警察、封建把头、监工……他們騎在劳动人民头上，用刺刀、鞭子奴役劳动人民。

九个老工人的“家史”，又是对新社会的一曲頌歌。他們用无限欢欣的心情，記述了翻身的历程，描繪了解放后的新生活。

看吧：

过去受压迫的工人做了国家的主人，当了人民代表、国家干部、劳动模范……

过去“懵懵懂懂”不知道革命道理的人，提高了觉悟，成了工人阶级先鋒队的一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失散了二十年的骨肉重新团聚了。

被旧社会折磨瞎了的眼睛复明了。

被逼作童养媳的女工走出了牢籠，建立了幸福美滿的新家庭。

在破庙、烟囱旁边栖身的工人住上了工人新村。

过去的文盲学会了文化，“老了又成了中学生”，什么也不会的人学会了技术。

.....

数不尽的事实，叫人讀起来久久地不能平靜。这难道不正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翻身的写照嗎！是誰从饥饿死亡中把他們挽救出来？是誰給了他們幸福的生活？九位老工人从內心里发出了呼喊：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領袖毛主席！是光輝燦爛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大字不識的老工人学文化时，激动得首先学会写共产党和毛主席，这正是反映了工人們对党和毛主席由衷的热爱。

九位老工人的“家史”，是一部生动的阶级教育的教材。它告訴我們：永远也不要忘本，永远也不要忘記过去。所謂不忘本，就是永不忘掉无产阶级的本质，永不失去无产阶级的本色，永不丧失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場。要做到这一点，就决不能忘記过去阶级压迫、阶级剝削、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懂得剝削，就不懂得革命。不知道历史，就不知道今天如何生活。我們許多青年人，是“生在苦根上，长在甜蔓上”的人，对阶级压迫、阶级剝削的历史不甚了解。他們有的只是从书本上学了一些阶级斗争的概念，体会并不深刻。像高玉志的妹妹小时候母亲抱着她要飯，解放以后一直在幸福的生活中长大，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

响，胡吃乱花。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有必要补上这“最基础的一课”——阶级教育课，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前辈是怎样生活的，永不忘本，永远保持革命的斗志，从长辈手中接过革命的“接力棒”，奋勇地向前奔驰。

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对旧社会的罪恶事实固然了解很多，特别是那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对阶级压迫之苦体会更深。但是，解放以后十四年多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的生活，也容易使人习以为常，而对旧社会的阶级苦逐渐淡忘起来。经常回忆过去，不但自己可以“温故知新”，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站稳阶级立场，而且可以用阶级斗争的历史来教育年青的一代。像天津化工厂工人苏玉勤，经常教育子女不忘过去，还领他们到过去住过的破庙里参观，告诉他们：记住这座破庙，记住工人阶级的血泪史。曹桂风的母亲，把自己要饭用的篮子、破被作为“传家宝”，经常用这些实物来教育后代永不忘本。这些都表现了老一辈对教育青年一代的高度责任心，是很值得提倡的。

抚今追昔，忆苦思甜。了解过去的苦，使我们更加珍视今天的甜，也使我们更加高瞻远瞩，展望美好的明天。现在，悲惨的生活虽然已成过去，但是，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还到处奴役和压迫人民，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毛主席教导下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忘记受压迫的阶级兄弟。在国内，反动统治阶级虽然已被打倒，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死亡的。正如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在无产阶

級革命和无产階級專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階級斗争是錯綜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們應該永远銘記。不要忘記，反动統治階級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复辟。他們並沒有忘記过去。有些人仍然保留着“变天賬”，“分土地的名单”，甚至有的地主每年到他被斗争的那天就偷偷举行“紀念”，教唆他們的子女要“报仇雪恨”。資產階級还在用他們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腐蝕我們，特别是影响青年一代。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也不斷在侵袭我們。我們一定永远不要忘記階級斗争，永远不要忘記“兴无灭資”，永远不要忘記工人階級的历史責任。正像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工人李荣盛說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現在仍然过着像我家解放前那样悲惨的生活。因此，我們既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也不能只扫自己門前雪，应当帮助全世界被压迫的階級兄弟，早日粉碎他們身上的鎖鏈，使他們家家户户，也都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李荣盛說得很对，这番話表现了新中国工人階級“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闊的胸怀。我們一定要发揚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加倍努力生产和工作，建設好我們的国家；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提高觉悟，提高本領，用实际行动反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反华大合

唱！用实际行动粉碎反动統治階級的复辟陰謀！用实际行动
来支援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石 坚

1963年11月

目 录

- 五十年間..... 李榮森(1)
- 我家的苦和甜..... 張金有(14)
- 我家的遭遇..... 王秀兰(24)
- 回忆我家的悲欢离合..... 李文发(34)
- 从地獄到天堂..... 苏玉勤(42)
- 我家的血泪史..... 郑金山(52)
- 永远不能忘本..... 高玉志(59)
- 血泪辛酸話当年..... 張瑞元(67)
- 我家的三件“宝”..... 曹桂凡(76)

五十年間

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工人 李荣盛

到1963年8月14日，我正好是五十岁。記得我小的时候，常听母亲說：“咱穷人能活到五十岁，就算是长寿的了。”的确，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到五十岁就死去了；自然，我要是不赶上解放，也早变成一堆烂泥，哪里还会有今天。因此，这些天来，心里非常激动，特别是当每天从工厂回来，跨进家門，看到里里外外的喜兴劲儿，就不禁想起过去那苦难的家，想起那些惨死的亲人，常常是一夜連一夜地不能安眠，总想找个人唠唠这些家常話。

一

我的老家是东郊的欢坨庄。記得在我九岁的时候，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間破烂的小土房里。当时我們兄妹五人，都很年幼。最大的哥哥刚滿十一岁；最小的妹妹，还在怀抱。全家人只有靠父亲每月挣的二十元工資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可是沒想到，就是这样的日子，也难得保持长久。

爸爸当时在市里給一家資本家燒鍋炉。由于成年累月

呆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爸爸一人顶着干，天长日久，就坐下了病。这年冬天，爸爸的两腿突然瘫痪，不能动弹了。资本家看从爸爸身上再挤不出什么油水，便给了五块钱，把爸爸推出大门。

当天夜里，爸爸由两个老乡架了回来。妈妈一听爸爸被裁了回来，又见爸爸病成这个样子，急得只向老天作揖：“天老爷呀！往后这一家大小，靠什么活啊？”

真是火上加油：旧历年关又要到了。有钱人家又是杀猪宰羊，又是添制新装；我家呢，连一顿稀粥也吃不上了。不懂事的大妹，一会儿跟爸爸嚷着肚子饿；一会儿又叫爸爸给她买这买那。爸爸看到这种情况，难过得整天躺在炕上唉声叹气。

一天夜晚，我们都睡了。风从屋顶吹过，好像鬼哭狼嚎。这时听爸爸哑着嗓子跟妈妈说：“核桃他妈（核桃是哥哥的小名），我看我这腿，这辈子好不了啦！现在我活着，只能给你们添麻烦，不如早早死了，省两口饭给孩子们吃。”

妈妈只是啜啜地哭，痛苦地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爸爸又接着说：“你跟我这些年，也没有让你享一天福，想起来真对不住你。我死了，你要能走道就走吧，别都在一块儿饿死。我死后不能闭眼的，就是惦着这五个孩子，他们都太小呀！”

妈妈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痛哭起来。边哭边说着：“你不能死！我活着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就是用我身上的肉，也要给五个孩子拉扯大！”

哪知爸爸这个倔强的人，只要他认准了道，是誰也劝不回头的。記得在轉年春天的一个夜里，爸爸就用他那給地主、資本家操劳一辈子的双手，拿刀子結束了自己剛滿四十七岁的生命。万恶的旧社会，終于把爸爸逼上了死路。

二

爸爸死后，全家人的吃喝穿用，都落在媽媽一人身上。为了活命，媽媽不得不把还在吃奶的小妹放在家里，每天天剛亮，就到地主家里做飯、洗衣、伺候孩子。每天晚上回来，还得搓些麻绳卖，常常到半夜或鸡叫才睡。两手打滿了血泡。就这样起早爬黑地干，仍然填不飽六口人的肚子。

有天半夜，我醒来睜眼一看，媽媽还坐在煤油灯下搓绳哩。她一边搓，一边在吃什么。我感到奇怪：媽媽到底吃的什么呀？再一細看，原来桌上放着一个盐罐和一碗白开水。这时只見媽媽吃一个盐粒，喝一口白水；停了一会，又吃一个盐粒、喝一口白水。我感到納悶，問道：“媽你吃盐干鹽？”媽媽苦笑了一下，說：“快睡吧，媽燒心，吃个盐粒、喝口水压压。”我一听，眼泪忽地一下涌了出来。燒心，明明是饿的呀！媽媽为了我們兄妹五人，熬尽心血。从爸爸死后才两年多的時間，媽媽好像老了十岁。我越想越难过，再也睡不下去了。

時間过的真快，一年一度的年关又到来了。媽媽为了让我们过个高兴年，特別用紅紙剪了一对吊錢貼在門头

上，然后又到杂货铺赊了六块豆腐丝，说是除夕晚上，每人一块。我们听了，高兴地跳起来。

哪知道，就是这六块豆腐丝，却要了妈妈的命！

大年初三，家家户户都还在欢度新春。一大早，杂货铺的掌柜突然来到我家，非逼着我妈在当天给他钱。妈妈向他央求缓几天。他不但不答应，还骂了起来：“穷老婆子，没长吃豆腐丝的嘴，就别妄想；吃了东西拿不出钱，快给我吐出来！……”说着，用脚踢得我家门坎咣咣直响。

妈妈人虽穷，骨头却硬，哪能受他这样污辱，一气之下，便把套在身上的那条单裤卖了，还了这笔阎王账。

账是还完了，但气却压在心上。第二天，妈妈便病倒在炕上，一连几天，滴水不饮，烧得不省人事。后来烧退了，人却完全脱了像，变成皮包骨。妈妈自觉着难以好转，便忙在病中给我们缝补衣服，一边补，一边擦眼泪。

有一天，我们从外面拾柴禾回来，妈妈把我们叫到炕边，先挨个地打量了半天，然后流着泪说：“妈看样子不能管你们啦！别恨妈狠心，这也是命里注定，该死在这六块豆腐丝上。往后全凭你们自己挣着活了。要记住：谁有一口饭吃，也要分给别人半口；可不要把妹妹给饿死了。要小心财主，他们的心可狠呀！”

就在这天傍黑，妈的病突然恶化，不到半夜，便死去了。任凭我们扒在妈身上大声哭喊，妈也一声不响了。妈比爸小三岁，死那年也正好是四十七岁。

三

媽媽的話真對，財主的心就是狠。記得在媽死後的第三天，我大爷突然从赵文庄赶了来。他家很有錢，就是絕戶（即无儿无女）。过去从来不让我家的人进他家的門，怕帶去了穷气。

这次他来到我家，先把屋里屋外打量了一番，看没有什么值錢的东西，轉过臉来，对哥哥說：“核桃，今天你先跟我回去，明天弄点粮食来。有大爷在，怎么也不能让你们小兄妹五个餓死。”

我們正处在走投无路、困难万分的境地，听他这么一說，真是十分感激。于是，我哥哥便跟他一块儿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兄妹四人，瞪着四双小眼睛，朝着进庄的大路，等呀，等呀。从太阳东升，等到吃过午飯；从吃过午飯，等到日落黄昏，仍然不見哥哥的影儿。但我們还没有死心，到了第三天、第四天，依旧等着、等着。最后，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直还没有音信。这时，我們才开始絕望，知道上了大爷的当。

真沒想到，这个杀人不見血的老家伙，欺侮我家没人，竟不花一文錢，便把哥哥給騙走了。我真后悔沒記住媽媽的話。

四

哥哥被騙走后，一家人就数我大了。当时弟弟是十二



岁，大妹妹是十岁，小妹妹才三岁，我也才刚满十四岁。别说家里那时一贫如洗，就是有吃有穿，要照顾好小弟弟妹三人，也不容易啊！

俗话说：没秧的瓜儿难长成，没娘的孩儿命难活。就在妈妈死后不满三个月的时候，小妹妹生病了。开始是发烧，以后就抽起风来，眼看着小妹妹枯瘦的身体，一会儿被抽成一个小肉团。我们急得没法，只得下手掰。但这哪能顶事呢！到第三天头上，我可怜的小妹，终于悲惨地死去。我一面哭一面想：可怜她来到人世三年，不但没有穿过一件圆衣服，就连一顿饱饭也没有吃过啊！

哪知，旧泪未干，又添新痛。在小妹死后不到半年，大妹妹由于整天思念妈妈和吃不饱饭，忽然在一天晚上，两眼失明，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她急得一面在地上跳着喊叫：“二哥，二哥！我眼睛看不见啦！”一面用十个尖尖的小指头，使劲地往眼上、脸上乱抓。不一会儿，满脸鲜血淋漓，但眼睛依然看不见一点东西。

因为眼睛失明，给大妹妹精神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不久，她便病倒在炕上。我们因为每天要去给地主家拔草，也不能整天在身旁伺候她，只能到吃饭的时候，把我们二人省下的一点饽饽，送给她吃。渴了就喝些凉水。看到她那一天比一天瘦弱的身体，我不知暗暗地流下了多少次眼泪。

一天，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和弟弟都没出去干活。吃晚饭的时候，大妹妹苦苦央求我说：“二哥，给我做碗挂面吃行吗？”我腰里连一个铜子也没有，但又不忍心不答应

妹妹，于是，便拿一个锄头，到杂货铺换了一把挂面，做了满满一碗，端到大妹手里。

大妹接过碗去，高兴极了。但是，吃不到一半，她把碗送到我们面前，说：“二哥，三哥，你们也尝尝，可好吃啦！”我劝她吃完，她执意不肯，我只好接过来。可是，又哪里能咽得下去啊！热泪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

猛然间，听弟弟惊恐地大喊一声，“大妹！”我两手一颤，碗“砰”地一声落在地上，摔成四半；碗里挂面，溅了一地。再抬头往炕上一看，大妹已倒在炕边死去。我只觉得头一晕，也倒在地上。……

五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一家七口人，就只剩下我们兄弟二人了。我们两个人在农忙时，就帮人干活；农闲时，就打柴为生。

记得1939年旧历腊月二十七日，我和弟弟跟人家借了个冰排，从赤土村一带打柴回来。那时候天色已黑，我们趁着淡淡的月光，顺着金钟河，拖着冰排往家走去。正在走着，听弟弟哎呀一声，陷进冰里去了。我连忙上前把他从河里拉出，人虽没淹死，但全身衣服都浸湿了。从此，弟弟便抱病不起，一连几个月不见起色。

到了第二年夏天，因为想弄点钱给弟弟治病，便向人借了五块转子钱，买了一挑菜瓜，准备到市里去卖。庄里人听说我要往市里卖瓜，劝我说：“日本鬼子在天津到处

抓劳工，你这去不是送死嗎？”可是我想，瓜已經买了，不卖怎么还人家錢，弟弟的病又怎么治？我下定决心，不管是死还是活，闖它这一趟！

这一天，我跟庄里船来到市里，把瓜挑往法政桥附近一放，很快就卖完了。一数錢，九元六角！去掉五元轉子錢，还淨剩四元六。手里有这么多的錢，还是我生平第一次，我特別高兴。誰知我正要站起身走，突然一人从身后把我抱住，馬上又过来一个伪警察，把我双手綁起来，带到了伪警察所。

这里所长姓张。我問他为啥抓我。他說：“怎么，抓你去做工还不好嗎？”我一听是做工，头“嗡”地一下就大了。跟着又听一个小跑說：“下午两点上火車，往东北去！”我心想，家里还有个病弟弟，我这一走，他还不活活餓死。我再三哀求姓张的放我，他总是死咬住两个字：“不行！”后来小跑在一旁說：“你真他媽的木头脑瓜。有这个嗎？”說着他用手比了个十块錢的数字。我一看沒有办法，只好把全部瓜錢，連本带利一齐給了伪所长。这一下，果然灵驗，他随即一摆手，便把我放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什么时候能把这些日本鬼子和汉奸都砍光啊？

六

1945年8月，日本鬼子终于向中国人民投降了。但那批汉奸，却搖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显官要員，繼續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这时弟弟在家里给一家地主种园子。我流落在天津，在老站一带扛零活。后来听说一家染整厂（即现在的印染二厂的前身）招收工人，我便跑去报了名。但还没有开始验工，心里便凉了半截。原来才招收十二个人，而报名的却挤满一屋子。后来又转念一想，既然来了，就碰碰运气吧！

开始验工了。项目是让你扛三趟大布包。一个大布包重二百多斤，外面捆着竹片子，又滑又硬。路程约有一百米，中间要经过两道单板的跳桥。

看到这种情况，一件件验工中发生的惨象，都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有的被压得口吐鲜血，有的被砸得骨断腰折……。今天，自己会不会碰上这个遭遇，真是难以预料。

想到这里，我的心便蹦蹦地跳了起来。正在这时，就听监工的喊我的名字：“李荣盛！”我开始一楞怔，但马上又稳住神，走上前去，把心一横，一使劲，二百多斤的大布包，一下叫我扛了起来，并且平平安安地到了指定地点。第二趟，也照样扛到了。哪知到了第三趟，情况却不同了：才走到半路，两腿便打起颤来，心也慌得要命，但我仍然咬紧牙，继续往前走。眼看就剩下两步远了，左腿突然一软，身子一歪，布包嘩地一下滚落在地上，肩膀被竹片刮破了一块皮，鲜血唿唿直流。

“真他妈的倒霉！白挨了三趟压。”我正在恼火自己，哪知几位接肩的工人兄弟，早代我把包滚到了地方，并且向我唠唠嘴，意思叫我快上前面报数。我感动地道谢了一

句：“謝謝兄弟！”便走到監工那里，說是扛完了三趟。真是意想不到，我竟然被取上了！

進了工廠門，心想總該過個舒心日子了吧？哪知進廠之後，却好像牲口給帶上籠頭，每天想不干也不行了。資本家和工頭看你不順眼，說打就打，說罵就罵。一天叫你干十二小時，什麼防護設備也沒有，累死累活，砸死軋傷，他們什麼也不管。簡直不把你當人看。

干活如牛似馬，但生活却還不如牛馬。玩着命干了一個月，到月底連自己肚子還填不滿；再加上當時社會混亂，污吏橫行，弄得人天天提心吊膽，不知哪一會兒飛來殺身之禍。因此每到夜里，常常做着各式各樣的惡夢：一會兒，夢到我也像爸爸一樣被資本家趕了出來；一會兒，夢到我平白無故地被國民黨軍隊挑死了；一會兒，又夢到我被美國吉普車軋成一個肉餅；再一會兒，又夢到我弟弟被地主活活打死。……

生活把我折磨得完全不像人樣了。不到四年的時間，我這個正在壯年的人，脊背開始駝了，臉上也添了皺紋。進廠時，還能扛動二百多斤的布包，現在却連一百多斤的東西也扛不動了。當然，我弟弟的處境，是更加淒慘。他每次來信，都是血、淚、恨、苦。我們是日日夜夜盼望着共產黨和解放軍，快來打開這地獄的牢門！

七

這樣的日子，終於叫我盼來了。

1949年1月，天津城头升起了解放的红旗。我和全市劳动人民一样，都脱离了苦海，见到了太阳。区里办了工人夜校，我就自动报名参加了学习。在学习时，我首先学会写共产党和毛主席，然后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不是吗？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哪有我今天的李荣盛！现在，我已达到初中文化程度，正学习物理、化学。真想不到，老了老了，又成了中学生。这真是越活越年轻！

在摘掉文盲帽的同时，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记得解放后，党第一个派到我们工厂来的同志，是薛代表。他和我们工人讲了許多革命道理，句句都打动了我的心。有一次，他说：“咱们穷人过去所以穷，就是因为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压迫。世上要是没有他们，也就没有穷根！”听，这话说得多对！

由于思想觉悟提高了，干活的劲头就越来越大。但前一时期，我只知道老老实实地闷头干，到了1958年，党公布总路线以后，我的脑瓜才开了窍。对呀！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实干加巧干，就得动脑筋、搞革新。于是我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四年多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三十多项，使有些产品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到十倍。

因为工作上作出了一些成绩，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从1953年到1955年，我被评为厂级劳动模范；从1956年到1957年，我被评为区级劳动模范；从1958年到1962年，我又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每当我捧着那耀眼的奖状时，心里就激动得难以形容。

也正是在1958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崇高的革命事业！

真是万事如意。在解放后第二年，我便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爱人也是工人出身，比我小十岁，但彼此感情很好。有一个孩子，也早已上小学了。全家三口人，现在不仅不愁吃、不愁穿，并且还添置了许多家具。

我的弟弟，解放后也翻了身。在庄里当上了生产队长。1961年，领导上又把他调到国营小淀葡萄园工作，专门研究种植葡萄的技术，成了国家的干部。1962年，他也结了婚，安了家，过着美满的日子。

但是，我也知道，今天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要过更好的生活，只有努力搞好生产。另外，还应看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现在仍然过着像我家解放前那样悲惨的生活。因此，我们既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也不能只扫自己门前雪，应当帮助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兄弟，早日粉碎他们身上的锁链，使他们家家户户，也都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邱 鸣 整理）

我家的苦和甜

棉紡五厂工人 張全有

离 乡

1910年，我出生在山东省寿张县李家园村一个雇农家里。那时，我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父亲给地主扛长活，母亲也给地主家帮工，尽管如此，一家四口人仍然是吃这顿没那顿，整天空着半个肚子。

给地主干活，就像给阎王爷当差，一个伺候不到，就要大难临头。爸爸每天太阳没出来就去地主家干活儿，直到半夜才能回家。有一次，爸爸病了，去得晚了一会儿，地主发觉后就大发雷霆，他抓住爸爸就往外推，就这样，爸爸被赶了出来。

爸爸被辞退以后，家里的日子更难了。为了找条活路，在我三岁那年的正月十五，爸爸顶着鹅毛大雪，离开我们娘仨，到天津谋生路去了。

我们原盼望爸爸能在天津找个事做，好养活一家大小，没承想，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了个事，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块钱。不但顾不了我们，连他自己也很难混上顿饱饭

吃。媽媽只好繼續給地主家幫工。她每天頂着星星去，又頂着星星回來，整天給地主家洗衣、做飯、推磨、做針綫，忙得不可開交。晚上回來，有時給我們提回一點兒地主家的剩飯，有時帶回來的卻只有辛酸的眼淚。為了活命，我和姐姐只得沿街去要飯。

日子就這樣艱難地過着，一晃，爸爸離家七年了，爸爸養活一家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那一年冬天，地主家要解雇一些幫工，他們借口媽媽的手腳不利落，把媽媽辭退了。日子實在沒法維持下去了，媽媽把心一橫，將半間草房賣了二百個子兒，稱了點兒面蒸成饅頭，帶着我和姐姐投奔天津來找爸爸。臨離開這個“家”時，媽媽眼含着淚，打量着賣掉的草房，對我們說：“孩子，咱走吧！死也要和你爹死在一起啊！”

說來也真巧，我們離鄉這天也是正月十五，也下着大雪。七年前的這天，爸爸抱着一綫希望到天津去謀生路，如今，這綫希望已經破滅，但我們娘仨還得走爸爸走過的路，誰知道在前面等着我們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呀？

安 家

到了天津，父親托一個遠房的姥爺在郊莊子賃了一間草房，我們就在那兒安頓下來。

第二年，我是十一歲。那位遠房的姥爺托人情、送禮物，磕頭禮拜地把我和姐姐荐到寶成紗廠去學徒。當時，爸爸在大星米莊干活，母親給人家看孩子，做針綫，全家

四口人，都沒有閑着的。每天虽然吃糠咽菜，但比起过去三天两头揭不开鍋和要飯的日子，总算好得多了。

1931年秋天我成了家。妻子也是苦人家出身。她的父亲把她送到我們家做媳妇，一来是为了給她找条活路，二来是为了減輕一点儿作父亲的負担。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她只有十三岁。

娶亲的那天非常熱鬧，工友們，邻居們都來祝賀。这个喜事办的也很簡單。就买了二两茶叶，用我学徒那年买的那把泥壺，泡了几壺茶。清茶虽比不上美酒，但在那个年月，能娶得上媳妇，喝得起茶，已經很不錯了。同年冬天姐姐也出閣了。姐姐走后，妻子就頂替姐姐在宝成紗厂上了班。

日子像海河的水一样，不声不响地流走了。一轉眼，我們成亲已經四年。这年臘月，妻子生了一个水灵灵的胖閨女。因为孩子和奶奶是同一天生日，所以給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双喜”。我成了家，生了孩子，生活也刚算稳定下来，誰想得到，沒有多久，灾难又临到我們一家的头上。

喪 父

1938年，也就是日本鬼子进天津的第二年，宝成紗厂轉卖给裕大紗厂，工人的日子更苦了。工人們不但受资本家、工头的剝削和压迫，还得受日本鬼子的欺辱和盘剝。这时，我每天的工資只能吃上几个窝头，連自己都吃不飽，更談不上养家了。

那时候，爸爸在大星米庄做飯，自己天天做着鸡、

鴨、魚、肉，吃的却是殘羹剩飯。做出的飯菜稍不合掌櫃的胃口，大巴掌就劈頭蓋臉地打了上來。有時，竟將整碗的熱湯潑到爸爸的臉上和身上。爸爸是個不愛說不愛道的老實人，每次受到欺負，都將氣和恨悶在肚子裡。

有一天，掌櫃做壽，要大擺酒筵。爸爸做魚的時候，不小心熬破了兩條。掌櫃一看，火氣就上來了，他硬說在這個日子裡把魚熬壞，是存心敗他的興，使他在客人面前丟臉。於是他將爸爸叫到眼前。爸爸剛進去，還沒站穩腳跟，他一個耳光將爸爸打倒，跟着又踹了一腳。爸爸這次被打，摔到牆角受了傷，鮮血從頭上流了下來，人也暈了過去。從那以後，爸爸就一病不起了。

為了給爸爸治病，我們把家裡的破爛東西全都賣光了，甚至連每天從廠子領回來的窩頭，也要換成錢。但是這點兒錢太有限了，進不起醫院，也請不起大夫，只能買點兒成藥吃吃。眼看着爸爸的病一天天的嚴重起來。

有一天，我正在廠裡干活，工友們帶來口信說：“全有，你媽讓你快回家。”我三步並成一步地趕到家，一看，爸爸只剩下最後一口氣了。他見我進來，含着淚望着我，半天才吃力地迸出一句話：“全有，你爹死得好苦啊……財主們的心，真像……”爸爸慢慢地閉上了眼睛，兩隻手，仍然緊緊地攥着拳頭。

雙喜的死

爸爸死後，支撐這個家的担子就全落在了我一個人

身上。要維持一家的生活，还得还爸爸病时欠下的賬。我每天从裕大紗厂下了白班，再赶到新中山鐵厂去打一个夜班。双喜的媽在裕大紗厂搖紗；媽媽在家照看双喜，得空也給人做些針綫活儿。一家老少就是这样拚死拚活地忙，掙来的錢也买不上几斤一日三餐的口粮，每当吃飯的时候，几个窝头让来让去，誰也不肯多吃一口，就連我那四岁的双喜，也懂事地把饅饅給奶奶給爸爸。每当我看到孩子这样，心里又是难过，又是高兴。

誰想，父亲死后不到一年，双喜也病了。双喜是生疹子。生疹子本不算大病，可是在那缺吃少喝的年月里，孩子病后一直得不到必要的調理，不久就轉成了肺炎。

那一天夜里，外面下着毛毛細雨。孩子一口接一口地喘着，昏迷不醒。半夜的时候，孩子忽然睜开了眼睛，伸出滾燙的小手喊着：“爸爸，我要饅饅！”孩子的喊声像刀一样刺着我的心，家里已經好几天沒吃上饅饅了，到哪儿去拿？这时孩子又喊：“我餓，吃饅饅。”我冒着大雨，叫开了邻居曹娘的門，要了一块饅饅，塞在孩子的手里。

不一会儿，孩子就起風了。小臉由紅变青，還沒咽下的饅饅也吐了出来，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断了气。这时，爸爸临死时紧紧攥着拳头的情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全有，你爹死得好苦啊！……”的声音又在我耳朵边响了起来。是啊！爸爸死的好苦啊！孩子死的好慘啊！是誰夺去了这一对老小的生命呢？

妻 走

双喜死了以后，他媽的神經受了刺激，整天“双喜啊，双喜啊”地招呼着。等到双喜的事料理停当，她再去上班，已經被开除了。

妻子一失业，家里的生活就更难过了。媽媽整天紡羊毛、拾煤蛋，还得要飯。我一天拼死拼活地干，仍然是三天两头揭不开鍋。失去父亲和孩子給我带来的悲痛，和生活的煎熬，使我变得愁眉不展，像个木头人。工友們都說：“全有，这一年的工夫，你像老了十年。”

日子又这样艰难地过了五年。这一年的年关到了。穷人最怕的是过年。富裕人家过年都穿紅挂綠、貼对子、办年货，可我們家又有两天沒做飯了。

大年初一那天早晨，妻子从娘家借了点儿錢，称了点儿面拿回家来。她說：“今天是大年初一，咱們来个‘合家欢乐’，吃一頓餃子吧！”我見她神态反常，一边包餃子，一边納悶儿。

餃子煮熟了，她把餃子分成三碗，將第一碗端在媽媽眼前，說：“娘，您快吃吧！”又拿給我一碗說：“你也快吃吧，看凉嘍！”最后她也拿起一碗，夹了一个餃子送进嘴里。餃子還沒咽下，她的眼泪就順着兩頰流了下来，說：

“我到咱家快十三年了，我真对不起你們娘俩，也对不起死去的爹和孩子。”停了一会儿，她擦了擦眼泪繼續說：“我不忍心再夺你們的口粮了。我走以后，全有的担子

还可以輕一些，要好好照顧着娘……。娘，全有，別記着我的不好，這全是日子逼得我這麼做的呀！我不走，咱全家都得餓死。”

她的話像一把刀子，剜得我的心痛。我們娘仨抱頭痛哭起來。十三年的夫妻啊！如今要分離了。是她無情無義嗎？是她受不住苦日子的煎熬嗎？不，都不是，是萬惡的舊社會逼得我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啊！

母 別

妻子走后，家里的日子仍然是結結巴巴的。那一年我由裕大紗廠轉到了新中山鐵廠。那里的活兒比紗廠累得多，玩儿命干一天活，就給九個小窩頭，還要留出幾個帶給媽媽，所以我從沒吃過一頓飽飯，好幾次昏倒在車間里。

正月十四的那一天，因為廠里加點，我半夜才回家。推開屋門一看，媽媽還沒有睡，正坐在燈下一針針地縫着我的一件破褂子。我坐在媽媽旁邊說：“媽，這麼晚了，先別縫了，您快睡覺吧！”媽沒有回答，只見一滴滴的眼淚落在褂子上。

半天，媽才停住手，慢慢地抬起頭，說：“全有，我已經打定主意，明天回老家去……。”我沒等媽說完，便着急地說：“媽，那怎麼行？”媽說：“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餓死啊！看你餓成什麼樣了？我走之后，你可以多吃兩口……。”我想，媽帶着我和姐姐來天津找爸爸的時候，家里已全賣淨了，這次媽媽回去，怎麼生活啊！媽媽看出了我

的心思，說：“不用擔心，我回去以後，先住在你舅舅家，不夠吃的，就要着吃。”

第二天天還沒亮，媽媽就動身了，真是無巧不成書，那天又是正月十五，所不同的，就是這天沒風又沒雪，是個大好的晴天。所不同的是，那年媽媽帶着我和姐姐都抱着一縷希望來天津投靠親人，這次，却是家破人亡之後，媽媽不得已，單身一人回已經一無所有的故鄉。我望着媽媽逐漸遠去的背影，想到這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逃的逃，心裡一陣發酸，眼淚嘩地淌了出來。

病 危

媽媽一走，我們這個家只剩了我一個人。我每天夜晚回來，看着這間四角杳見空空的房子，和學徒時買的那把泥壺，說不出有多么傷心。

為了能積攢幾個錢，把媽媽接回來，我常常是從鐵廠下了班，再到別處去干點兒另活。有一次，我去新倉庫給日本人挖溝，正是十冬臘月，西北風颼颼地刮着，溝里的水結了一層薄薄的凌碴。為加快挖溝的速度，監工呼喊着讓工人們跳下溝去挖泥。大家不肯下去，監工過來舉起皮鞭就抽了下來，我頭上挨了一鞭子，跟着又一腳，把我踹到溝里。我只覺得浸在水里的下半身針扎一樣的疼痛，不一會兒，兩腿就麻木了。

回家以後，我就一頭扎在炕上起不來了。渾身像火煎一樣，頭似千斤重，只要一閉上眼，就又看到了監工的皮鞭

和馬靴。

出嫁的姐姐聽說我病了，跑了几十里路來看我。但是第二天她婆家捎來信，說她公公要死，得馬上回去。臨走前，姐姐買了斤棉花，用我的那條破夾褲做成了一條棉褲。她一邊縫着，眼淚順着兩頰流了下來。她嗚咽着說：“這個家算完了，兄弟，你不行的時候就自己穿上吧……。”她又拜托了左鄰右舍，告別了昏昏沉沉的弟弟，就趕回婆家去了。

新 生

姐姐走後的第二天晚上，屋裡進了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他把屋裡打量了一番，就撲到炕上叫道：“大哥，你这是怎麼啦！”我睜開眼睛打量了半天，才識出他是自己過去一塊兒在紗廠干活兒的窮弟兄王恩義。五年多以前，王恩義離開了廠子，就不知去向。王恩義又重新打量了空洞洞的房子，問道：“娘呢？”“回山東老家去了。”“不是還有個小侄女嗎？”“死了。”“嫂子呢？”“走道兒了。”他聽完我的回答，一頭臥在我身上，哭了起來。

那天晚上，他住在我家了。他告訴我他已經參加了八路軍。他說：“八路軍是給咱窮人打天下的。窮哥兒們早晚要翻身，大伯的仇早晚要報的。”

那天，我明白了許多道理。第二天臨走，他掏出了腰裡仅有的肆角錢給我，讓我好好養病。只是消極、難過，是打不倒反動派的。王恩義的話就像大旱的年月下了一場

透雨，給我增加了新的希望和力量。

不久，我的病好了。我沒有忘記王恩義的話，在地下黨的領導下，我參加了罷工運動。到1948年，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49年天津解放了。幾千年的窮根挖掉了，幾輩子的仇算報了，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人的日子真的來到了。

如今，我在棉紡五廠機動部當倉庫管理員。我又重新建立了一個家庭，日子過的火爆極了。結婚那天，媽媽從山東趕來，親戚朋友歡聚一堂。我還是用我那把小泥壺，打了滿滿的一壺酒，大家喝着喜酒，向我祝賀着。我的心里熱乎乎的。

此外，我還告訴你呀，同志！原來離開我的雙喜她媽，1962年時也找到了我，還來過一封信。她如今也建立了新家庭，生活得很好。因此，我給她回信說：“如果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咱們恐怕早就死了。我們可不能忘了黨和毛主席的好處啊！”

（孫長瑛、孔繁和、宋金發 整理）

我家的遭遇

棉紡五厂工人 王秀兰

解放前，我家九口人，就有五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被万恶的旧社会活活地折磨死去；剩下的我們姐妹四人，除去三妹在母亲去世以后就给了人，至今沒有下落之外，其他三人，都在很小的时候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过着人間地獄般的生活。因此，凡是了解我家情况的人，都說我能活到今天，过着这么幸福的生活，是全靠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現在，我已建立了家庭，成了孩子的媽媽，但想起过去的家，想起媽媽那时过的生活，真是两代人，两个世界。

从苦水里被拖进火坑

1931年，我生在天津市近郊一个穷人家里。我七岁那年，全家八口人，只有一床破棉被和一条破褥子，住在一間快要塌了的小土房里。冬天，冻得人整宿睡不着觉；夏天，悶得人喘不出气来。

当时，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小妹妹，这么一大家子人，全靠父亲一个人拉洋車維持生活。后来，实

在没法过了，只得离乡背井，逃难到天津，住在裕大纱厂（现在的棉纺三厂）一间窄小的工房里。爸爸仍然是拉洋车，两个哥哥后来都进了裕大纱厂学徒。在那个世界，虽然有三个人在外干活，还是顾不上一家人的吃喝。大哥和二哥一天挣的钱，买不了一斤杂合面；爸爸不分白天黑夜地连轴转，经常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满，再加物价飞涨，钱不值钱，家里还是常常揭不开锅，个个瘦得皮包着骨头。妈妈看到这种情况，经常急得擦眼抹泪。有一天，她指着姐姐的小名对爸爸说：“大肥她爹，我看这样下去，咱一家都活不了啊！要不把大肥给了人家，让孩子去逃一条活命，换几个钱也救救家里的急。”爸爸痛苦地点点头，两眼噙满泪水。

几天以后，经别人的介绍，妈妈就决定把姐姐卖给郑庄子的陈大筐家当童养媳。谁知，在姓陈的来领姐姐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可怕的恶运意想不到地落在我的头上。因为姓陈的看姐姐长的身材瘦小，满面病容，这时，改口非要我不行。妈妈忙解释说：“二肥今年才九岁，不懂事啊！千万不能……。”陈大筐没等妈妈说完，瞪起两眼嚷着：“怎么，给猪肉钱，买羊肉还不行！穷老婆子别不知好歹。”说着，拉起我就要往外走。我吓得浑身发抖，紧抱着妈妈的腿大哭起来。当时，爸爸出车还没回来，妈妈也不敢惹他们，只好流着泪对我说：“孩子，去吧。我对不起你，以后就当妈死了吧！……。”

从此，我这个不满十周岁的孩子，便离开了亲人，从

苦水里又被拖进了火坑。

一个月里发生的事

我走出家門的第三天，爸爸才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来，一进门，姐姐、妹妹都张着手找爸爸要吃的，爸爸怔住了，惊奇地问妈妈：“二肥哪里去了？”妈妈便把陈大筐要我换姐姐的事告诉了爸爸。爸爸听说我被陈大筐领走了，马上就瘫在地上，再也动弹不了了。全家人都围着爸爸哭。停了一会儿，爸爸才慢慢地说：“这个世道，让咱亲骨肉分离，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还得眼看着卖第二个、第三个……。这还怎么活下去啊！”说完，慢慢地站了起来往外走去。妈妈紧赶了两步，拉着爸爸死死不放，哭着央求道：“肥她爹，你不能死啊！要死，咱全家死在一块儿。”爸爸说：“死在你们眼前，连领破席都买不起，不是给你们找麻烦吗？你照看着孩子们吧！”说完，转身就走了。从此，爸爸就再也没有回来。

爸爸走了十来天，一直没有音信，这时，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妹妹。妈妈知道爸爸一定是死了，一点儿指望也没有了，就整天哭，不吃不喝，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终于，在爸爸走后二十天头上，就咽了气。妈妈死了连领破席都买不起，只好在炕上躺着。后来，还是邻居的大娘们领着我们挨门磕头，才凑了点儿钱，买了一领破席，把妈妈埋了。刚出生没过满月的小妹妹，因为没有奶吃，也活活地饿死了。那个三岁的小妹妹瘦得小骨头一根一根的，脸焦

黃，我們也疼不起她，只好送給人，后来，就再也沒有下落。一个月的工夫，万恶的旧社会就夺走了我家四口人。后来，我的姐姐和大妹也只好給人当了童养媳。

两个哥哥的死

大哥、二哥在織布場学徒，每天干十二小时的活，下班后，还得去中山鋼厂打鑄子工，作“苦力”，常常累得連路都走不动，再加上吃不飽，日积月累，大哥得了肺病。大哥得病后，更沒有力气干活了，就被資本家赶了出来。那时候，穷人連飯都吃不上，得了病还不是等死？大哥連气帶病的不久就死了。他那年才二十岁。

大哥剛死不久，二哥也得了肺病。这时，我們姊妹三个都已当了童养媳，所以二哥的情况比大哥更慘，成了无着无落的孤儿。

那时二哥每天上下班都是扶着墙走，咳嗽上来，連腰都直不起来。有一次，在車間里咳嗽，只觉得心里一热，大口大口的鮮血噴了出来。工头一看，一手捂着鼻子，一手往外推二哥，罵道：“你哥哥早就在閻王爷那里給你挂了号，你他媽的还活着干嘛？”二哥忙跪倒磕头，有气无力地說：“別开除我，沒活儿干，我吃什么？”“你喝西北風我也管不着。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就这样，他們把二哥又推出了厂門。二哥剛到家，后面就跟进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大声喝道：“搬家！开除的人不准住工房。快点儿，快点儿！”

二哥好不容易挪到街上一个墙角里，就蹲下咳嗽起来。从早晨到晚上，连一口水也没喝。天黑时，附近一个好心的徐大娘，看着二哥实在可怜，就到处求人，叫二哥在一家馓子铺架油锅，好有个存身的地方。干这个活，得整天站着，二哥的病身子，哪里能顶得住？没有多久，二哥就带病带累的不像个人样儿了，浑身肿得像“河漂子”，苍蝇爬满了身，整天晕迷不醒，嘴里念叨着死去的亲人。就这样苦熬了三年，终于在二十岁的时候，悲惨地死去了。

两套铁笼子

全家九口人，只剩下我和姐姐、妹妹三个人了。我白天、黑夜地想念她们，惦记着她们的生活情况。其实，姐姐和妹妹两家，也都是穷人，她们在这个家的生活，比我们原来的家好不了多少。只是现在的处境比我强点儿就是了，不像我这样，整天挨打受骂。

从我九岁进了陈家的门，就像进了铁笼子，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陈大筐以“卖破烂儿”为名，其实专门欺骗穷人，喝人血养肥了他。对我，还不如对他家的一只狗，吃的是发霉的坏东西，成天挨打挨骂，一年到头，老是新伤接旧伤，伤不离身啊！

到了我十五岁那年，他们为了榨尽我的血汗，便送我到中纺四厂细纱车间学徒。当时我心想，要是进了工厂，平日在陈家呆的时间少了，总不会再整天挨打挨骂了

吧！誰承想，家里的打罵还是照常，反而又加上厂里工头的打罵了。工头知道了我的身世，更是冷眼看待，他們常說：“这路人打了沒乱儿。”（指不会出乱子。）

上夜班的时候，白天下班了，伺候老、伺候少，做飯、刷洗、扫地……还是都扔給我一个人干，一天也閑不住。白天不眨眼，夜里再干一宿，時間一久，我就支持不住了。有一次，一根綫头还没接上，我就站着打起瞌睡来，工头远远地瞥見，走过来，朝我的前額狠劲地彈了一下，当时，可把我彈“蒙”了，疼得直轉圈。工头走了，我以为沒事了，哪知，他又拾起盛紗管的鉄盒子，两手高举着，拚命地朝我擲来，我一跑，正打在我的迎面骨上，大口子像小孩嘴一样，鮮血“喇”地一下流了出来。工头任意打罵工人，是常有的事。

陈家好比“鉄籠子”，进了工厂，又多了一层“鉄籠子”，真是家里、外头活活地把人整死。

結 婚

我在陈家的“鉄籠子”里整整悶了九年。九年間，我吃的是猪都不願吃的东西，身上穿的补釘罗补釘，沒有一件圓圖衣服。每次关了錢，婆婆連錢条都要过去，只是恰頂恰地給我留个摆渡錢，連买块咸菜的錢也沒有。

我十八岁那年——1949年，天津解放了。婆婆一看風头不对，那年4月，有一天，她拉着我，装成亲热的样子說：“你們的事，快点儿办了吧！”当时我心想：“还想让

我給你們當一輩子牛馬？”我心里不願意，可是不敢說。婆婆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刻收起了強裝出來的笑容，嚷道：“我把你養活了這麼大，看你敢生歪心！告訴你，願意也得照辦，不願意也得照辦。你活着是陳家的人，死了是陳家的鬼，甯打勞的主意，死了那股子心吧！”

這時，不知她從哪里翻出一雙紅鞋來，讓我穿上。我就穿上這麼一雙紅鞋結了婚。

我一連哭了好幾夜，一直哭得眼腫得睜不開。

得 救

1950年11月，我生了第一個孩子。有一天，人事科的一位幹部親切地對我說：“你不是在國棉五廠附近住嗎？現在給你調換到五廠工作好不好？省得你每天抱着孩子過河上班。”我有點兒不信他的話，說：“我太願意了，能行嗎？”他說：“怎麼不行？領導就是幫助工人解決困難，搞好生產的。”

我心里高興極了。來到五廠的第一天，領導通知我：“你明天上中班。”我不明白地問：“怎麼還有中班呢？”他解釋說：“現在黨為了照顧工人，已經改成‘三八’制了。”我听他這麼一說才明白，原來每天干十二個鐘頭的活，現在改成八個鐘頭了。

每天下了班，姐妹們都仨一群、倆一伙地說說笑笑，要不就是上業校學識字、扭秧歌、打腰鼓……。我真眼熱她們，但就是不敢去。有一次，我跟幾個姐妹正在一塊走，

被陈大筐看见了，就厉声说：“你敢跟她们一块混，她们都是野人！”从此，我又不敢跟别人一块走了；上业校更没门。

领导上知道了我的处境，一天，女工委委员刘洪达找我谈心。我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十七年来的苦水，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最后，我把埋在心里多年的想法也说了：“洪达姐，这个家我实在呆不了啦，有没有办法和他家一刀两断？”刘洪达说：“共产党把我们工人解放出来，就是让我们翻身，得到自由。”我一听，高兴地说：“那么，我一定逃出火坑去！”厂里的姐妹们都替我说话，帮助我，人民政府给我作了主，就在1952年10月我和陈家脱离了关系，这回我可真正得救了。

入 党

我常这样想：我是爹娘身上掉下来的肉，爹娘是我的亲人，可是爹娘却不能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使我翻身，得到自由。党比爹娘亲，党给我的是自由，使我成了工厂的主人……。我每时每刻想着党对我的恩情，工作起来劲头就特别大，有了困难事、困难活我都愿意抢着去干。在车团干部的帮助下，我的认识逐渐提高了，不久，我提出了参加团组织的要求。组织热情地鼓励我说：“只要好好地工作，要求进步，听党的话就行。”一提到党，我的决心就更大了，就在1952年10月24日我光荣地入了团。

以后，党老是跟亲爹娘一样关心我，给我指出努力方

向。我呢，也老是和姐妹們團結在一起，互相幫助，黨指東我就奔東，黨指西我就奔西。

1956年9月28日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日子，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當我舉起右手宣誓的時候，面對着毛主席的像，就仿佛毛主席真的站在我的眼前，我鼻子一酸，眼淚嘩地一下子流了出來，我恨不得跑過去，緊緊地握住毛主席的手，向他老人家訴說黨怎樣救了我，和我要永遠跟着黨走的決心。可是這怎麼能行呢？我輕聲地說：“我永遠跟着黨走，永遠跟着毛主席。”

建立新家庭

廠里姐妹們知道我是苦命人，老說：“秀蘭，你過去的十七年，真是苦水泡黃連，苦上加苦啊！如今解放了，還不重新建立個家庭？”她們勸我搞個對象，建立個新家庭。後來，經過劉姐的介紹，在1956年10月6日，我便和派出所的民警敦占元結了婚。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他們都是在托兒所長大的。現在，我不愁吃、也不愁穿，日子過得火爆極了。

和我一起當了童養媳的姐姐和妹妹，現在都是天津郊區公社的社員，解放以後，她們的生活都是隨着集體化的發展，逐漸富裕起來。如今，我們常來常往。

過去，我常在夜間做惡夢，總是夢見受折磨，在快要斷氣的時候猛然吓醒，就再也不敢睡了。

如今可不同了。夢見的，都是和廠里姐妹們搞生產競

賽、看电影、带着孩子們溜公园……。醒来，高兴得再也睡不着了。

在旧社会里，不知有多少穷苦的姐妹被折磨死，如今，新社会的生活又是多么幸福啊！

新旧对比，真是天地之差，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現在我只有一心一意地好好生产，听党的話，永不忘本，永不變心。

(李余庆 整理)

回忆我家的悲欢离合

永利久大法厂工人 李文发

灾难临門

我家原住在塘沽西場村。二十年前为了謀生，才搬到东大沽。那时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养活。但是，在那个年月里，身强力壮的父亲却找不到活干。他今天在碼头上“扛大个”，明天，跑到荒郊给人家迁坟；上午给人家抬花轎，下午，给人家抬棺材……。只要能給家里挣点豆餅吃，无论什么样的苦活、累活，他从不挑，总是成天成宵地干。就这样，他也常常找不到活儿，有时在外面轉上一天，只得空着口袋回来。每逢这样，父亲就一屁股坐在炕上，两眼瞅着屋梁。不懂事的小弟弟們，喊着向父亲要吃的。父亲瞅着一群面黃肌瘦的儿女，要哭又不敢哭，泪水往肚子里咽。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不得不狠心把十四岁的姐姐早早地嫁到远地。

“喜事不登穷人門，灾难不由穷人心”。1942年，父亲由于长期劳累过度，飯食又跟不上，终于病倒在炕上。父亲一躺下，真是灾难临門。不用說沒錢給父亲請大夫抓

药，連病人吃的也弄不上。急得媽媽求邻居找亲戚。但是，亲戚邻居都和我們一样是穷人，哪里有錢借給我們？变卖东西吧，家里又沒有一件值錢的，我只好領着大弟弟去討飯。在那个年头，靠討飯怎么能养活六口人呢？要到稀的，哥俩就喝点，要到干的，哥俩舍不得吃，留着給父亲。可是拿到家里，父亲瞅着一群小的，怎么能够舍得吃呢？媽媽死說活劝的，父亲吃一口两口，就推說“吃不下”，給了小弟弟們。就这样，父亲終於断了最后一口气，这时，父亲才三十五岁，正是壮年时期。在他死前，父亲餓急了，背着我們把土炕上的泥草都吃了，他死后，我們发现他滿嘴都是炕上的黑泥！

父亲一死，撇下了我們这群能吃不能挣的娃娃，日子可怎么过呢！我是孩子中最大的，才十三岁，个子小，身体又弱，下面还有吃奶的弟弟。媽媽看着我們这群可怜的孩子，再想想以后的日子，愁得黑天白日的泪水洗臉。投亲戚吧，穷亲戚誰能养活这么一大家人？討飯吧，上哪去討呢？正在叫天天不語，呼地地不应的时候，沒有人心的房东，乘人之危找上門来，硬逼着我們搬家，不搬家就砸鍋，摔盆……。一大帮人，大冷的天，往哪搬呢？餓不死也得活活地冻死啊！媽媽拉着我們跪在房东面前苦苦地哀求，有錢人的心是最狠的，他哪管你这一套？

就在这天夜里，媽媽把心一橫，上了吊，幸好，被我发现，找来邻居，終算搶救了过来。

苦海飲恨

为了养活一家人，我便到小碼頭当了油色工，一天的工錢，自然不够一家人的吃喝。没办法，我只得白天上小碼頭刷油色，晚上，就下海拾“网眼”，掏螃蟹。在那个年头，地痞流氓，到处敲詐。有一次，我拾“网眼”时在路上碰上了东沽的恶霸“滾地雷”，不但搶走了魚，还打了我一頓耳光子。又有一次，我去掏螃蟹，在路上又碰上了这个“冤家”。他为了陷害我，找伪警察要了一块木板叫我扛着，企图以偷木板的罪名，把我押送給日本水上衙門。后来，我趁伪警察打电话的机会，偷着跑掉了，才算躲过这场杀身大禍。

有一天，我用木榔头敲铁锈，不慎将木榔头掉进海河里，正好被一个姓张的狗腿子看见，他朝着我就是一脚，我一下栽到河里去了。幸亏抓住了浮标，才沒被淹死。我爬上岸，狗腿子还不解气，非逼着我下河把木榔头捞上来不可，捞不上来就叫我“滾蛋”。你们想一想，那末深的海河，叫我上哪里去找茶碗口大小的木榔头呢！这不是明明逼人下河自杀嗎？結果，我还是被开除了。

我被开除以后，全家人像被投落在苦海里一样，再也沒有一条活路。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个姓宁的亲戚，給媽媽想了个卖儿女的点子。媽媽怎么舍得把自己的亲骨肉卖掉呢！这个外号叫“宁缺德”的人，纏住媽媽唠唠叨叨說得天花乱墜，媽媽虽然不信她的話，可是又想，不走这条

路全家一个也活不成，就狠着心，把怀里的四弟交给了“宁缺德”。誰知道，这个“宁缺德”把弟弟卖给別人以后，只给了我们三斤豆餅，媽媽連想带气的，差点发了瘋。

刚刚卖了小弟弟，“宁缺德”又找上門来了，要劝媽媽改嫁。媽媽恨透这个伤天害理的魔鬼，把她撵走了。誰知“宁缺德”并不死心，她勾結着当伪保长的外祖父（阴阳仙）三天两头登門，逼着媽媽改嫁。而媽媽是早已下定决心，宁死也不走这条道。

那知有一天，突然从船上来了几个坏蛋，硬逼着媽媽和两个弟弟跟他们走。眼看着一家人要被活活拆开，痛苦得媽媽紧紧地抱着我泣不成声，說什么也不离开家門一步。坏蛋們沒有办法，便凶恨地把媽媽和弟弟往船上拉。就在这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媽媽便纵身跳了河。船工們下到水里，把媽媽打捞上来，坏蛋們就急忙把船开走了。后来，才听說被逼嫁给山东一个姓王的人家。从此，就剩下我孤苦一人，流落在塘沽。

孤苦伶仃

外祖父他們，在卖媽媽和弟弟这桩生意中，捞了不少錢財，但是，他們却不肯收留我这孤儿。我只好挟着一条破麻袋，白天討飯，翻垃圾箱，夜里住破庙，蹲房檐。一条破麻袋，冬天的时候白天当穿的，夜里当盖的，冻的浑身发抖。夏天，蚊子、跳蚤咬，一宿也睡不着，就这样，混了一年多。

后来，舅舅把我介绍到港里一条船上伺候日本人，日本人像对待狗一样地任意打骂我。衣服洗不干净举手就打，饭菜端撒了，抬腿就踢，晚上“叫岗”，叫晚了或早了，也免不了一顿打骂。打你还不准你叫，越叫打得越厉害。本来我的身体就弱，加上白天黑夜地伺候他们，刚上船时，总是晕船。可是那些禽兽不如的日本鬼子不管你这一套，只要他们看见你晕船，就像捆猪一样地把我捆在船桅上，一捆就是一天一夜，不给吃的喝的。在我十五岁那年的3月，有一天，日本人叫我烧洗澡水，水烧好了，日本人把手往水里一伸，大概嫌水烧的不热，把我举起来就扔到十三米深的大海里。幸好，被工人抢救上来，才没被淹死。鬼子把我折磨个够，最后还是把我开除了。

正在这时，跟着妈妈去山东的九岁的大弟弟回来了。哥俩搂在一起哭的死去活来。弟弟告诉我，妈妈嫁到王家后，继父的姐姐“母老虎”三天两头地给妈妈气受，动不动的就打骂我两个弟弟，没过多久，“母老虎”不经妈妈的同意，便把小弟弟卖给人家了。卖了小弟弟，大弟弟的恶运也难逃，妈妈就叫大弟弟逃跑，可是一个九岁的娃娃，往哪儿跑呢！他跑了几次，都被“母老虎”抓回去痛打了一顿。最后，大弟弟才一路打听，一路要饭，走了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塘沽。

弟弟这一来，吃饭更成问题了。

过去的街坊邻居们，看我们哥俩怪可怜的，七凑八凑，给我们哥俩对付几元钱作本钱，哥俩就挎着小篮，满

街吆喝着卖糖块。就这样，我們混一天，活一天，日夜盼着媽媽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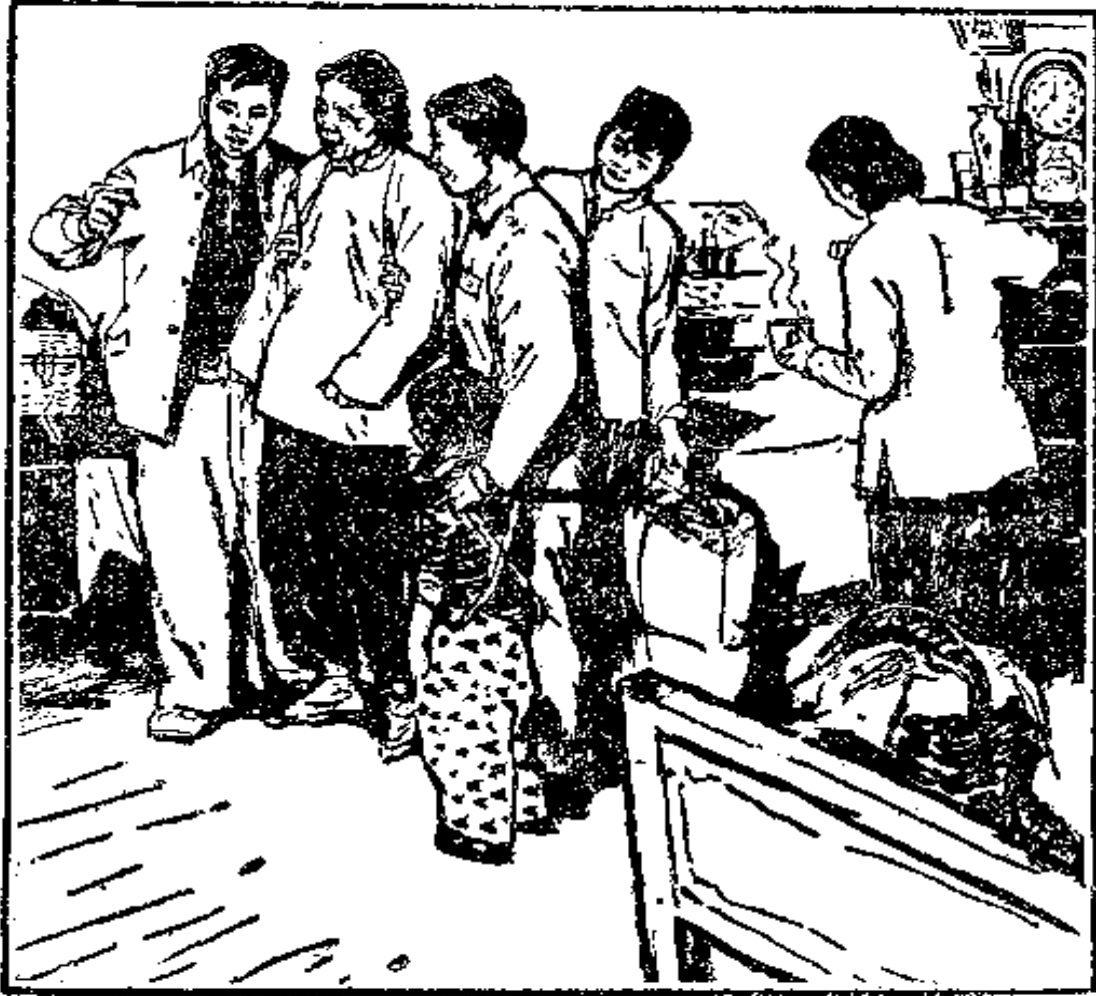
骨肉团聚

还没有把媽媽盼回来，先把共产党和毛主席盼来了。解放不久，派出所就給我們哥俩找到了工作，我到永利碱厂，弟弟到船厂学技术。我們的生活开始稳定了。在我二十四岁那年，街道代表又帮助我这个旧社会的“要飯化子”娶了媳妇成了家。

解放后，我虽然有了家，生活也逐年地提高起来，可总还是有份心事不能解决，这就是我常常想念被逼走的媽媽，和被卖掉的弟弟。尤其看到街坊邻居老小几辈团聚一堂的时候，这份心事就更重了。于是，我决定先找被“宁缺德”卖掉的弟弟。

在政府的帮助下，我很快地就找到了四弟弟。原来四弟弟在他一岁那年，由“宁缺德”卖给了本区一家姓孙的人家。这家人对待小弟弟还算不错，现在他也在永利厂工作。

1959年的一天，我的大孩子跑到家里告诉我說：“山东有个姓楊的找你。”我真有点納悶，在山东除了有个姓王的母亲外，一个亲友也沒有啊！还没等我往下想，推門进来了一个二十四、五岁，一口山东腔的青年。我还以为他找錯了人呢！做梦也沒有想到，这就是我的亲弟兄——老三。哥俩見了面，想哭，哭不出眼泪；想笑，又笑不出声



来，攢了十七、八年的一肚子委屈話，一时又忘得干干淨淨。二弟聞信赶来后，哥三个談一陣抹一陣眼泪，眼泪一夜沒断。当談到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苦难时，弟兄三个又痛又恨；談到新社会的幸福时，弟兄三个又是喜笑颜开。原来三弟在山东被“母老虎”卖給了无棣县一家姓楊的药鋪，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却是倒土倒尿、洗衣服、倒茶水的小奴隶，受尽了楊掌柜的打罵。等到弟弟长大成人时，楊掌柜的就打起了买卖人的一本万利的算盘来，他們“猫哭耗子”——假慈悲地把弟弟收为义子。就这样，三弟的李姓改为王姓，王姓又改为楊姓。

在1961年，我們日夜想念的媽媽，終于也来到了塘沽，找到了我們。分离差不多二十年的母子見了面。

.....

穷人，过去为什么这样苦？現在为什么这样幸福？

是旧社会逼得我們穷人缺吃又缺穿，是旧社会逼得我們家破人亡、生离死别，卖儿卖女，弟兄四人三个姓。

是新社会把我們这拆散的骨肉团聚在一起，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救了我們这帮死活不得的穷人。

（永利久大沽厂工会 整理）

从地獄到天堂

天津化工厂工人 苏玉勤

有一天，我領着两个女孩子上街去了，路过一座土地庙門前，特意到里边看了看。小庙的房山东倒西歪，沒門沒窗，里边堆滿了碎石烂瓦。他們天真地問：“爸爸，看这破庙干嘛？”我沉思了一下，心想，他們成长在我們新的家庭里，生活在幸福的新社会，这庙里的泪，这庙里的恨，他們怎能知道呢！我对他們說：“看看吧，这座破庙就是你們的一課书！”

晚上，他們問起看庙的事情。我就給他們讲起了过去。

我的老家在天津南郊的葛沽鎮。我二十九岁那时候（1939年），全家穷得一壠地也沒有，租种地主的园子地，累死累活地干一年，吃不飽穿不暖，末了，还欠下租子。地主逼着要，說：“砸鍋卖鉄也得把租子交上！”逼得全家无路可走，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我媽受惊帶气地死在了葛沽鎮。她临死时把我叫到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說：“小子，你爹死得太早了，我穷苦一辈子，掙一口吃一口。往后掙一口气！……”說到这，她咽了最后一口气。举家人

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用一张破席把老人卷巴卷巴就埋了。家里沒吃的，只好拿着棍子討飯去。富人家要不來，窮人家又沒有剩飯，靠要飯哪能顧住全家五口呀？

鄰居們勸說到外邊找找活路，我想，這也許能行。我用扁担挑着七歲的禿子和他五歲的弟弟，領着禿子的哥哥和他媽媽，頂着早春的風沙，漫行在一眼望不見村的鹽鹵地帶。

開春的風沙，天天刮個沒頭，在荒野里行走，大人睜不開眼，孩子哭哭叫叫，想找个避風的地方也找不到。可是，肚里餓得咕咕叫，哪有勁挑他們兩個呢，我挑一會兒就得歇一會兒。他媽心痛我受累，有時候硬叫禿子下來走，可是禿子那時候瘦成了一把骨頭，眼窩子塌得像酒盅一樣，站起來風就可以吹倒他，他哪能自己走！我心里痛得不敢再扭頭看孩子，眼淚止不住地往嘴里流，硬挺着腰板担着他們赶路。

來到了塘沽，心想好好歇歇腳吧，這是個大地方，給孩子們要口飯吃，攢攢勁再往前走。誰知道，在這裡要飯比在鄉村還難：大工廠進不去，商號里連在門口站站也不讓。有一次，禿子的哥哥到一個飯館要剩飯，掌柜的硬說他偷了饅頭。上來就是一巴掌，一下子把孩子打倒在路溝里。狗也依仗人勢，上前就咬他的大腿，要不是行路的好心人把他拉起來，就得被狗咬個稀爛。他含冤抱恨地走回來，一點飯也沒有要來，他媽一見，鼻子一把淚一把地擦不完。可是她只能勸孩子多小心，不好要的地方就別去

要。别的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一路上吃苦要飯，哪黑哪住，街头巷尾，馬路沟，大树旁，就是穷人的炕头。葛沾到汉沽不到百里路，我們就走了七、八天。要不是心里有个盼头，盼望到汉沽找点活干，这一段路再走十天也走不完。

可是，到了汉沽怎么样呢？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哪里也沒有穷人的活路，沿街討飯的人成群結队，他們找不到事作，咱哪能找到！我后悔不該来这里，有心領着孩子返回去，可是，返回去不还是照样挨餓！这百把里路就是鬼門关，闖不过去，十有八九就得死在半道上。我对秃子他媽說：“哪里也沒有咱穷人抬头的地方，豁出五条命，就在这里混吧。”白天，全家人分头出去要飯，晚上，一家人就住在那間土地庙里。这庙，你們都看过了，一个門口两个沒樁的窗窟窿，沒有門板，只有四个墙脊兒，冬天大北風直往屋里灌，热天蒼蝇蚊子落滿梁，可是，再髒再臭也得住。地主資本家住高楼瓦房，穷人沒房沒地，不住这住哪儿？要是遇上刮風下雨，不能出門要飯，一家子就得挨餓。

这样过了半年，听說工厂招人。我磕头作揖，死說活說，总算进了东洋化学厂（現在的天津化工厂），当建厂杂工。好不容易进厂做工了，每天大清早进厂，按照厂子的規定，先把門口写着自己名字的白牌翻过来，再給日本人鞠个躬才能去干活。那时候，每月掙八十八斤粮食，說是粮食，其实淨是糠皮皮，哪够五口人一个月吃的！就是这点粮食，他們也是百般刁难啊！有了病不給，出了工伤也



不給。就是發下了，把頭、狗腿子還要剝削你，把好的給你換成次的，把次的給你換成更次的。要是高興了，他們就發給你，不高興，你要也不給。家里沒吃的，禿子他媽還得抱着二小子挨門討飯。

不料正在困苦難熬的時候，禿子他哥被日本鬼子抓勞工抓走了。我在廠里干活，一點也不知道。家里正指望他要點飯吃，他這一走，孩子們吃啥呢？他媽的眼皮哭腫了，怀里抱着孩子在廟台上等我回來，盼我想個辦法搭救孩子。可是，那個世道到哪裡去講理！我們忍冤含淚，到車站去看望禿子他哥，他被關在一間黑屋裡，說是很快要被火車運走，他見媽媽去看他。滿腹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光低著頭哭，他媽把留着給三小子吃的兩個仅有的糠窩頭給了他，讓他別忘了爹媽，不管走到哪裡，要來個信。禿子他哥知道兄弟們都沒吃的，不肯接過那兩個窩頭，在窗口讓來讓去。看見這，我的眼淚也流個沒完，我說：“你媽給你，就收下吧。爹媽養了你這麼大，想不到落到這樣的下場，以後，你要能回來，就想法回來！”誰知道這麼一說，惹了禍，看門的警察把窗子咔嚓一關，我們再也看不到他了。眼淚只好往肚裡流。他走時，才十二、三歲。從此，就再也沒見他的面，後來才聽說他被折磨死在煤窩裡了。

這以後，要飯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了，天氣越來越冷，三天兩頭刮海風。我和孩子還穿着露肉的單衣，在廟裡凍得坐不住，要飯更出不去了。我每天下班回來，總要到工廠大伙房裡要點泔水，自己捨不得喝，留着給孩子們吃。

要來泔水多吃點，要來就餓着。

有一天夜里，餓得我實在睡不着了，起身就要上工廠去，想把炊事員要潑的泔水提來，禿子他媽攔住我說：“孩子他爹，這麼冷的天，你還穿着單衣服，把我的棉褲穿去吧。”她說着，便把她那舊棉褲脫了下來。一個男人怎能穿紅褲子呢？不穿吧，太冷，我想了想，便把它翻了個里朝外。

到了廠門口，日本兵問我幹什麼的，我說上班的（說要泔水是不行的）。他渾身上下把我搜了一遍。什麼也沒搜出來，還不叫我走，逼着我脫衣服。不料這一脫，日本兵大驚大叫起來：“啊，你的紅軍的干活，八路！”說着從兜里取出哨子猛地吹了起來，十幾個持槍的鬼子兵，不開青紅皂白，把我綁在電綫杆子上。一個日本軍官大聲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說：“工廠的工人。”他搖搖頭說：“你的八路密探，紅軍！”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紅軍是什麼樣子。他們不信，強迫我承認是八路軍，用鐵絲把我兩個大拇指緊緊擰在一起，鐵絲上拴着一根繩子，把我吊在警察室的房梁上。我只覺得鑽心的疼，棍子、板子又噼里叭啦地打在身上。後來頭一昏迷，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們用涼水澆醒我，還是逼着我承認是八路軍的密探。我說啥呢，要說，只是對他們的仇和恨。我咬着牙沒說一句話。他們從我嘴里什麼也沒得到，更凶狠起來，他們從火爐里夾出通紅的煤塊往我身上燙，背上的肉，燙得滋滋地响，一種難聞的焦臭味充滿全屋。他們還是不放鬆，一

块接一块地往身上烫，直到我再一次昏了过去，他们才放下火钳，把我扔出屋外。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大天亮了。厂门口拥挤着进厂的工人，大家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谁能不生气呢？不知工友们说了多少好话，鬼子才把我放了。工友们含着泪水，忍着愤怒，把我抬到了那座破庙里。秃子他妈见我成了这个样子，一头扎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怎样活下去呢？她心里的苦已经够多了，我又成了这个样子，大人哭孩子叫，要不是有这些孩子，我真不想活下去了。第二天，我的伤口肿了老高，不是工友们借给钱买药膏，我哪能活下去！

一晃七天过去了。可是，人歇着，肚子不能歇呀！一家人靠我吃饭，我只得强打精神，忍着疼痛去上班。别人的粮食发下来了，偏偏没有我的粮食，他们说七天不干活不给粮食。世上就有这样的冤枉事：干了活，挨了打，粮食还不给。我把这事向工友们说了，大家气得肚子硬梆梆的，全说找日本人说理去，不给苏玉勤粮食就不干了。这事传到翻译官耳朵里，才发给我一个月的一半粮食，那一半就硬不给了。敌人的心，就是这样狠毒！

我为了给家里省点粮食，晚上下了班不回家，便到大伙房要点泔水，自己喝一点，给家剩一点，谁知道就在这两三天内，三小子在庙里饿死了。他妈没有衣服，不能出门，等着我下班埋掉他，一直等到第二天，还不见我回来，便叫秃子去把三小子扔掉。秃子那时候才七岁，哪能抱动

五岁的死孩子，他把弟弟抱到了沟边，再也抱不动了，只是看着弟弟哭，不肯把弟弟扔掉。邻居们告他说去找你爸爸吧，他这才到厂里去找我。那时候我一听这，心像碎了一样，命，眼看着一条一条的死掉了，还有什么活头呢！有心不再去看三小子，可是不能把孩子扔在沟边呀！他活着没有遇上好世道，死了，也该让他安安稳稳地躺着。我含着泪水，把他埋在沟边。走回家来，他妈冻饿带，坐在地上连走都走不动了，脸肿得黄腊腊的，浑身上下，也全肿起来。下身没有衣服，盖着一片破麻袋。我递给她一罐泔水，她放在一边，说：“给孩子留着吧。我死了，也别让秃子再死了，他是咱家的根，长大了，叫他知道妈妈是怎么死去的。”我一听，坐在她跟前抱头大哭，秃子在妈跟前也哽咽起来。

就在这时候，庙我们也住不成了，村里的富人们嫌我们把庙住脏了，硬逼着我搬进一座比庙还潮湿的看守菜园的小土屋里。进去站不起身来，只能在里边躬着腰走。我上班后老是担心，不定哪天会突然塌了，把孩子他妈砸死。

可是，不愿意朝哪走，旧社会逼着你非朝那走不可。三小子死后不到七天，外边大雪纷飞，我正在锅炉房满头大汗地干活，秃子忽然哭着跑来对我说他妈死了。

刹时，我像傻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站在门口，望着漫天大雪。工友们问我出了啥事，我说不出话来。我头前走，秃子在后面紧跟着。到家里，他妈的身子已经冰凉了，硬挺挺地躺在潮湿的草窝里，雪花飘进屋

里，落在她的身边。看得出来，她可能是昨天晚上就死了。临死，沒和她見个面，沒說一句話，我对着她的尸首說：“我对不起你，你死得好苦啊！”

泪水，已經哭干了，我不再哭了。我知道她是怎么死的，自从大孩子被鬼子抓走以后，她的气，一天天多，她的恨，一天天深，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填不飽。是誰給她带来的恨呢？今天我才知道，是万恶的旧社会，是我們的階級敌人——地主、資本家、帝国主义、反动派……

他媽的尸首躺了三天，还是工友們帮助，借了領席，算把她埋葬了。从此，我离开了这座冰冷的小屋，全家五口死去三口，我和秃子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可是，我还得上班。把七岁的孩子放在哪呢？再放在庙里，被人偷卖了咋办？让他进工厂，警察像狗一样在門口把着，哪肯放他进去！但总不能把他放在街上不管，我大着胆子把他領进厂来。警察拦住不让进，我說：“家里死得沒人照顾他了。”他們說：“滾，誰問你这个！”举起枪托子就往外赶秃子，我憋了一肚子火，就和他們讲起理来。工友們围了一大圈，全替我說好話，警察見苗头不好，怕把小事鬧大了，才答应把他带进来，不許他来回走动，只能在一个地方呆着。就这样，到上班的时候我去干活，下了班爷俩盖着一个草袋子睡在烟囱旁边。烟囱里冒出的黑烟，熏得睡不着，实在沒办法睡了，就用洋灰紙蒙住头睡。一直到汉沽解放，我們才从这个黑暗的地方里走出来。我們这些从前受压迫受剝削的工人，現在成了主人，

政治地位提高了，生活也改善了。

不是新社会，我哪还能建立新的家庭呢！

不是共产党，秃子哥能翻身嗎！

現在，我們全家住的是新工房，大儿子和大女儿也和我一起在天津化工厂工作。三个小女儿有两个已經上了学。領導上對我們上了年紀的工人，处处关怀照顾。全家人高高兴兴，不愁吃不愁穿，和过去比，真是天上地下。思前想后，我不能忘記过去，也不能让孩子们忘記过去。1963年的春节，秃子領着媳妇來向我和他继母拜年，我們全家九口欢聚一堂，我就又想起了土地庙里的事。我說：

“現在咱們生活在天堂里了。在旧社会咱們多么苦啊，有誰知道这座庙里死过多少人呢？你們要記住这座庙，記住咱們工人階級的血泪史，記住現在的世界，还有些地方有許多像我从前在土地庙里一样生活的人。”我告訴孩子們，要記住爸爸是怎样生活过来的。

孩子們說：“爸爸苦难的过去，我們永远不会忘掉它。今后，还要請爸爸多給我們讲一讲。”我答应了。我想，我應該給他們讲，不仅讓他們記住我們的过去，也應該讓他們的后代永远記住我們的过去。

（韋 野 整理）

我家的血泪史

永利久大沽厂工人 郑金山

我是永利久大沽厂的运煤灰工人。原是东大沽人，靠打鱼摆船为生。抗日战争时，父亲带着我们搬到塘沽。

帝国主义杀死了我的亲人

以前，我家人口很多，到我爷爷这一辈，以扛盐为生。家中有二伯，老叔，父亲，母亲和我们这一些孩子。听我爷爷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塘沽就被“老毛子”占领，到处杀人放火，老百姓到处逃难，没有东西吃。我二伯无故被“老毛子”杀害了。

1943年，日本鬼子千方百计地残害中国人民。在他们的第四次强化治安中，工人连杂合面、豆饼都吃不到了，饿死的人到处都是，我的老叔就是在这一年饿死的。

阶级敌人对我家的残害就这些吗？不！他们对我父亲的杀害更为残忍，对我一家的迫害更为狠毒。

父亲的惨死

父亲为了让我们能吃顿饱饭，拼命干活。他在永利盐

場做“承攬工”，一個人負責掃兩個鹽場的鹽船，每天得兩處趕，所以黑夜白天都不得閑。後來父親實在頂不住了，就讓我去幫助掃船。

一天黑夜，我父親去替換我，永利門前的日本鬼子不讓進廠，只好繞廠后面的白灰埕。偽鹽警說我父親是偷鹽的，用手電照住我父親的臉不移開，父親眼一花，哎呀一聲，失足落在滾滾的白灰水中，當時就昏迷過去了。我聽到父親的喊聲，扔下掃船的筲帚便跑過去，從灰水里把他拖上來。我簡直吓傻了，抱着父親大聲哭嚎，偽鹽警還說他是偷鹽的，并用腳狠命踢我，逼我去干活。扛鹽的工人們氣極了，一擁而上，偽鹽警才走了。工人們用鹽筐把我父親抬到永利醫院門前。那時窮人進醫院是不易的。到醫院正是夜間四點，醫院不給開門，讓等到天明。那麼重的燙傷，等到天明人不就完了癢？經我們苦苦哀求才開了門，一問我父親是承攬工，永利醫院不給治，又求告了半天才給上了點藥水，可是馬上讓我交錢，我說了聲“現在沒有錢”，就叫我立即把人抬走。我只好馬上去借錢，借了七八家鄰居，大家才湊了點兒錢，只交了藥錢，交不出住院費，因為已經過夜，不交住院費不讓出院，但也不給治。我父親疼得實在受不了，叫我想辦法背他回家。我只好哀求看門的老大爺。天下的窮人向窮人，看門的老大爺說：“我在这儿看門，你不交住院費把人背走，這不要蹬我的飯碗子嗎？這樣吧，等一會我去廁所，在我一回頭的工夫，你背着就跑，我鬧幾句，追不上就完了。根據老大爺



教給我的办法，又找了个邻居帮忙，才把我父亲背回家去。因伤太重，走的又急，父亲到家就不省人事了。沒多久，父亲就拋下我們孤儿寡母死去了。

死里逃生

沒了父亲，生活的担子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我見母亲、妹妹和弟弟都快餓坏了，就拚命地找工作，可是哪有工叫我做。后来，見到郭庄子一个姓赵的华工头招挖煤工，說先給四十斤杂合面，走后家里还能領四十块钱，我便不問死活地背着母亲当了挖煤工。

第二天，我騙母亲，說掙来四十斤杂合面，还得出門干几天。我含着眼泪到了八号碼頭，工头們給我們換了华工服，赶进大船仓，封了仓盖，便起锚开船了。

途中船因为上煤停下了。日本鬼子让上去六个人打水，我一看机会到了，立即搶着上去。上来一看，碼头上都是中国人，知道这还是在中国，但不知是什么地方。在日本鬼子一扭臉的工夫，我便隱身在大船头的绳纜后边，停了一下，就从锚眼钻出去；大船头很高，往下看都眼暈，我把眼一閉順着锚鏈子滑到水里，因为我身上穿着衣服和笨重的皮靴，扑騰了一会就渾身沒劲地昏迷了。我醒过来时，躺在一只小船上；小船上的人問我之后，知道我是逃跑的华工，他告訴我这地方是东北的葫芦島，他給我換了一身衣服，把我送上岸，指給我方向，要我快去逃命，我千恩万謝地和他分手，朝指給我的方向往前走。一

天，到了一个小車站，車站上正停着一列煤車，我想跟这列煤車走。挨近一看，車上有押車的人，不能上去，我只好偷偷地爬进車弓子里，趴在車軸板上，車开起来震天动地地响，風砂打的睜不开眼，一会的工夫我就迷糊了。車不能进关，到出海关停了下来，我没有証明不能进关。沒有証明要进关的人挺多，大家一商量，夜間便一起从长城上爬过来，等了一天照原样搭火車回到了家。

骨肉分离

我的“劳工証”、“身份証”全让华工头沒收了，沒有这些什么也别想干，为了生活，我和母亲到处磕头拜年，才又到永利扛碱扛盐。一天，我和一个工人推轆轤馬，車一辆挨一辆，下坡时，他一不小心跌倒了，車从他身上軋过去，当时鮮血滿地。我們正在搶救，包工头来了，他一看大家把車停下就急了：“催媽的，还不快干，碱都快运不出来了。”工人說：“这个人伤的很重，赶快送医院吧！”包工头把眼一瞪，說：“有你們的嘛事，把人搭到‘鍋伙’去，你們給我干活去！”小把头也跟着张牙舞爪，工人們再說也沒用。晚上穷哥儿們服侍了一宿，一再向帳房交涉也无效，到天亮，人就活活地疼死了。人死之后，工头叫人搭到厂后面的八門埋了。

媽媽还是天天討飯，就这样，全家还是半饥半飽。物价天天漲，錢毛的像手紙，穷人簡直沒法活了，母亲看到孩子們餓的光剩皮包骨了，眼看全家就要餓死，为让孩子

們逃活命，把我九岁的妹妹小丫头送給了一个常在連塘庄算命的姓崔的女瞎子去作童养媳，妹妹去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拨云見日

苦尽甜来，1949年1月，塘沽解放了，工人当了国家主人。由于工資的調整，物价的穩定，我們的生活不断提高。我結了婚，生了孩子，母亲臉上多少年見不到的笑容今天出現了。国家給了我新盖的宿舍，我从“破瓦寒窑”搬进了雪亮的新瓦房。这天，母亲把我叫到跟前說：“金山哪，我們可真是翻身啦！你可不能忘記过去呀！要好好的干活，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来报毛主席的恩呀！”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可是母亲心里有一个疙瘩怎么也放不下。在她欢笑的臉上有时出現一些阴影，甚至有时暗地掉泪。有一天，她热泪滿面地說：“金山，你妹妹小丫头已离开我們十几年了，連个信都沒有，不知她是死了还是活着，过去日子逼着我，想的还少些，現在日子好了，我沒事就想。这些日子一閉眼，她就在我眼前。”于是我便到处打听妹妹的消息。

1953年上半年有一天，一个陌生的姑娘来到我家，一进门，看見我母亲，刚刚喊了一声“媽媽”，就哇地一声，哭倒在我母亲怀里。

我母亲看看她头上是不是有块疤。等我母亲把她的头发打开一看，老人的双手颤抖起来，一把拉住姑娘，喊了

声“小丫头”，老人两眼淌着热泪，再也說不出話来了。

通过我妹妹自己讲，我們才知道她的遭遇更凄惨。自从姓崔的女瞎子把她領走，就把她帶到天津宜兴埠押給了一个唱戏的，因嗓子不好成天挨打，后来嗓子实在不行，又把她退給瞎子。瞎子将她帶回楊村，瞎子的丈夫每天让我妹妹拔一亩地的麦子，拔不完不但不給飯吃，还捆在树上毒打，并且挖了一个坑，威胁她說，再拔不完就活埋了她。后来把胳膊肘都捆得支出来，一个卖棉花的老大爷見她可怜，夜間把她救出来，告訴她奔天津的道，让她快走。我妹妹头也不敢回地往天津跑，到了天津，因肚子沒食又走了一夜，便暈倒在馬路上。一个巡捕告訴她說，我家的人都死了，絕了她的希望，便把她拐卖給罗斯福路（现在的和平路）的一个資本家当丫头。解放后資本家跑了，把她扔在天津，政府把她安置在鼓楼大街孤儿院，并参加了工作，在工作中入了团。起先她对自己的家不抱希望了，后来大家都找到了家，她也向組織上提出了自己的事，組織上下了很大力量，才帮助她找到我們。

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对党的認識越来越清楚，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1955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和我的全家都是党救活的，我决不忘本，一定要听党的話，干什么活也不嫌髒怕累，一定把我的一切貢獻給党，为党艰苦奋斗一辈子。

（李英麟 整理）

永远不能忘本

天津港务管理局客运站 高玉志

“永远不能忘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这是我的母亲刘副琴，在1956年1月逝世前对我的遗嘱。曾有几回，她把我叫到身边，神情严肃、一字一句地说：

“孩子，你不要忘记，旧社会把我们一家八口，逼得生离死别，卖儿丢女，只剩下了四口，新社会却使我们拆散的骨肉，又团聚在一起。孩子呀，你要永远记住这阶级苦，千万不能忘本……”

母亲在世时，也常对我们和街坊邻居谈起一家人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从来不嫌絮烦。当时我想，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老要念叨呢？现在想来，我的想法是错了，母亲的想法是对的。因为她老人家比我在旧社会所受的苦要多些，对阶级压迫的体会要深刻些，才在经历了一生悲欢苦乐的生活终点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要永远跟着党走，我就不能忘本，让我再回忆一次过去的生活，来纪念我辛劳一生的母亲。

我的老家在天津郊区葛沽大高庄。当时一家七口，奶奶、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后来又添了一个妹妹），全靠着爸爸打短工或摸鱼虾来维持生活，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1939年发大水，房塌屋倒，一家老小，只好和灾民们一起逃进葛沽镇，挤在破庙里躲避风雨。

天灾还没有过去，人祸接着跟上来了。日本鬼子亮着刺刀在葛沽镇抓“劳工”，不幸把我爸爸也抓走了。当时兄弟几个，我是老大，也只有十一岁，全家人靠谁劳动呀！妈妈看着老的老小的小，愁得走投无路，好几次领着我们到村口的河旁去转游。我问她老在这里转游什么，她就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才知道，她打算带着全家人投河。可是到了河边，看看大的，再看看小的，下不了这份狠心，还想出一口气，不能这样窝窝囊囊地死去。

爸爸被抓走后，一直没有音讯，奶奶连饿带惊就病倒了。妈妈为了救奶奶，又想给孩子们一条活路，万般无奈，把还只有三岁的小弟全顺，卖给了人家。小弟被人家领走后，妈妈端起碗来就哭。就是这样，奶奶的病也没有好，没钱请医服药，凄凄凉凉地死在破庙里了。

那时候，葛沽镇像我们这样的难民多得很哪，大家挤在一起，哪有活路！妈妈不得已抛弃家乡，领着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流浪到天津市里，在河西区谦德庄一带挨门求乞。没过几天，忽然有一个妇女，怜悯起我们来了。她给我们一点钱，又说要给我们找活干。这简直是个“大

善人”，媽媽感激得不知怎样好了。誰知到了第二天，那个“善心”的女人，忽然露出凶相，带着几个打手，生夺硬搶，把我妹妹带走了。天呀，像我們这样穷要飯的，到哪儿去叫冤，到哪儿去喊屈？媽媽带着我們在七經路一带轉来轉去，希望能够再看一眼我妹妹的影子。但是，这只是一个梦想了。

那时候，天津这地方，連要飯也呆不下去了。我們又流落到塘沽，仍然依靠要飯糊口。想不到第二年，爸爸从东北牡丹江逃回来了，他找到了我們，一家人又喜又悲。不久，爸爸在碼頭上当了“散工”，卖苦力，換些糠糠菜菜，搭了个窝鋪，总算結束了一家的流浪生活。可是，这样的日子也过不长呀！沒过两年，新添了一个妹妹后，爸爸因劳累过度，又病倒了。平时干一天吃一天，一天不干一天就揭不开鍋，哪来的錢請医吃药呀！媽媽整天发愁，也无法給爸爸治病，只好眼看着他痛苦含恨地死去。

沒有几年，我們一家八口，死了两口，卖了一口，被搶走一口，就只剩下四口了。

我还未到十六岁，就不得不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后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国民党軍隊盘踞在塘沽。我好容易在碼頭上排了号，当上一名“散工”。碼頭上多的是大小把头，有些把头是专门榨童工的血汗的。他們起早就把我們赶到碼頭上，像成年工一样装卸貨物。到了傍晚，他們又出了“鬼招”，把一批批重活分配下来，你想想，一个十五六岁的童工，餓了一天，干了一天，肩背上还扛得起那些

一二百斤重的大包貨物嗎？好，扛不動，就刷下來，回家去吧！要錢，把頭一揮手說：“不給。這是規矩，誰叫你們不把這批貨搬走！”就這樣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天，還是空着手回家。

到了1948年，在碼頭上也混不下去了。媽媽和弟妹拾破爛，揀煤核，無論如何也填不飽肚子。

……

舊社會逼得我家破人亡，骨肉分離。

舊社會逼得我家顛沛流離，走投無路。

可是，苦根在什麼地方呢？剛解放時，我也只有二十掛零，對過去的悲慘遭遇，還是挖不著根。

解放後不久，我和二弟玉忠，都很快找到了工作。我在塘沽碼頭上，成了正式的裝卸工人，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

在抗美援朝運動初期，有一天，在我家住的西鄰村附近，看見有些人在搶着買當天的報紙，有的嘴里還嚷着：“看看上面有沒有好消息！”他們所說的“好消息”，就是美帝國主義的飛機是不是在東北扔炸彈。這些人中有一個叫馮連元的，他是過去的流氓頭子。當時我很納悶，為什麼解放了，他們還盼着美國鬼子在中國人民頭上扔炸彈？我回家後把這事和媽媽一說，媽媽就警覺起來，“孩子，這幫人解放前逼得我們無路可走，解放後還指望我們再過倒霉的日子，真是咱們窮人的死對頭。”接着我又把這些情況和派出所的同志們說了，在同志們的启发下，我才明白



了这就是阶级斗争，过去我们的苦，就是这帮地主、资本家、地痞流氓等剥削阶级所造成的。

挖到了苦根，我就恨透了这帮人。我们一家人都投入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斗争。有时候，母亲在村里了解情况，我就在外面搜集材料，终于帮助公安部门破获了几件反革命的案子，把冯连元也逮捕起来镇压了。

妈妈成了街道的积极分子，在一场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在一次次运动中，获得治安、卫生、拥军等五个模范称号，旧社会的“叫化婆子”，今天却被选为市、区人民代表。在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在党的教导下，也于1955年入了党，并且由一个装卸工人，成了现在天津港务局客运站的党支部书记。

我们的家庭有了意想不到的显著的变化，但是妈妈还是常常念叨着过去的苦难遭遇。她说，不想想过去的事，怎么能恨透像冯连元这样的阶级敌人，怎么能感到新的生活的甜？想起过去，我们常常要念叨在1939年卖掉的小弟和被抢走的妹妹。

1954年1月18日，妈妈正在家中养病，看见进来个年轻的妇女，妈妈以为是区妇联的干部来了解情况。谁料想这个“妇联干部”竟扑到妈妈怀里，流出了欢乐的眼泪，叫起了妈。这正是我失散十几年的妹妹玉强。

原来那年她被人抢走后，就被卖给住在河西区的一个姓臧的日本翻译。名义上是养女，实际上是倒屎倒尿、做饭洗衣的小老妈子。到了临解放前一年，这个坏蛋看到妹妹

已經長大，逼她在一個工廠里做工，却拿走她的全部工資。如果，晚解放一年，她勢必要受到更大的折磨。解放后，妹妹的覺悟提高得很快，在1949年就入了黨，后来又成了中共和平區委的干部。在葛沽大高莊的黨支部書記的具體幫助下，找到了我們。現在她是和平服裝社的黨支部書記。

拆散十几年的骨肉，在新社會中又團聚了，媽媽當然十分高興。可是，她有時還是念念不忘舊日的痛苦。她的身體在舊社會受盡了折磨，落下很多疾病，到了1954年，腎臟炎、高血壓、心臟病等都接連而來。住了一回醫院，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心照顧下，总算暫時治好了。1956年1月，舊病復發，領導上設法請最好的醫生給她治病，用最好的藥，區、市的領導同志還親自來看訪她。她常常和我們談起奶奶和爸爸是怎樣死的。一直等到她經過百般搶救，實在無法，就要死去的時候，还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氣喊着：

“永遠不能忘本！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媽媽死后，我們根據她的遺訓，把全家要飯時的一條破被子和一條破毯子，好好保留下來，作為“傳家寶”。

這幾年來，我家的生活一直在上升着，我也結了婚。1962年，那個在1939年離開我們的小弟全順，也找到我們了，他在葛沽公社當社員，還是個民兵隊長。可是，在歡樂的生活中，我偏偏沒有很好地遵守母親的遺訓，不常談起過去的痛苦遭遇，以至使我的妹妹走了一段彎路。

我的妹妹今年是二十一歲，解放的時候才七歲。她可說是生在苦根上，長在甜蔓上，她該上學的時候上學，

生活里充滿歡樂，只知甜，不知苦。我也覺得她生下一歲沒了爹，十四歲沒了娘，就不想使她在生活上“受屈”，十分遷就她。正因為對她放鬆進行階級教育，結果使她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沾染上胡吃亂花的行為，盲目地跟一些講究享受的人們看齊，甚至犯了錯誤。後來她在團組織和我們的幫助下，改正了錯誤，走上了支援農業的勞動崗位。

妹妹的錯誤，曾經使我痛苦，可是找不到一個答案。後來學習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以後，才進一步認識到這實際上是一場階級鬥爭，妹妹這麼一個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居然也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了。我痛定思痛，問我妹妹：“難道你就忘了媽媽抱著你要餓了嗎？”她哭着說：

“這些我並不知道。”真的，從解放她才七歲，她知道得太少了。這時候，我猛然意識到媽媽在世的時候，總向人們講述過去的痛苦遭遇實在是太必要了。正是因為我對妹妹放鬆了這樣的階級教育，沒有給她補上這必要的一課，才使她走上了錯路。這一個教訓，促使我時時刻刻不能忘記母親的遺囑，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過去的痛苦生活，時時刻刻不能放鬆自覺的思想改造，同時我也要把自己生活道路上的經歷告訴大家。讓我們更加痛恨舊社會，更加熱愛新社會，熱愛黨，堅定地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奮鬥。

（潮 濤 整理）

血泪辛酸話当年

天津玻璃纖維厂工人 張瑞元

我快六十了，打十四岁进工厂，在旧社会做了三十多年工。給中国資本家干，給洋人資本家干，累折了腰，还是填不飽肚子！那年月，兵荒馬乱，三年五年换一个“派头”，可是換湯不換药，不管誰坐天津，受压迫受剝削的还是咱工人！

如今，咱工人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当家做主，学政治，学文化，都行。就拿我说吧，旧社会的“臭工人”，大老粗，可如今都在业学校里上到了初中程度啦……。旧社会里，你想学文化？一天做十三、四个钟头工，成天頂着星星去，望着星星回来，奔波那两頓飯，一年到头，还連双鞋都混不上呢！

那时候我在厂里当保全工，工錢还算比较高的，一天一块三角五伪币。可厂里配給的一袋黑面，后来就漲到十三块伪币；孩子有了病，买服“回春丹”也得五、六块钱。沒啥拖累，就我們两口子，年輕力壮的，还得賒賬拉饥荒呢，不用說再有几个孩子拖着了！

这会儿，你看我这屋里，有立着的大橱，有躺着的

柜，满满当当，豁亮新鲜。收音机哇啦啦响，穿衣裳吧，咱自己有缝纫机。要不是咱共产党，咱毛主席，说梦话也说不到这个呀！要说早先屋里没个什么，也是瞎话，像头上的塌灰，地上的跳蚤，墙上的臭虫血……不有的是！对了，现在屋角里放着的那口破缸，也是我旧社会里干了多半辈子落下的一点家当，要不是破了，连这点也存不下，早换了杂合面啦！有的年轻人说，这口破缸摆在屋里，有点扎眼。可我舍不得扔它。看见这口缸，我就想起我过的那些苦日子，想起我那些死去的孩子，我就越觉得眼下实在幸福，越发活的有心气。

如今，我跟前就一个闺女，可我有过七个孩子，都是在旧社会里出麻疹，得痢疾，请不起大夫，抓不起药，眼瞅着活活煎熬死的。说起这话来，有些人兴许不大信，出疹子还能死人？谁说不是呢！像眼下，孩子一出麻疹，厂里的大夫马上来家看来了，带着进医院，汤是汤，水是水，药是药，还能糟踏得了孩子！

可在旧社会，那些资本家、有钱人的少爷小姐，才有这个好运气呢。他们的孩子有个头痛脑热，用手指头拨弄几下电话机子，大医院的救护车就开到家门口了。咱工人呢，孩子出了疹子，耽搁来耽搁去，东挪西借，好容易凑合上几个钱找个开小铺的医生看看，但人家挥挥手说：

“回去吧！转成肺炎了。”那年月，咱穷人的孩子得了这病，不就是个等死！我的六个孩子，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地送掉小命的。

我記得那正是日本人占領天津的時候，當了亡國奴，苦水泡黃連，真是苦上加苦啊！我和老伴那會兒雖說還年輕力壯，但要養活一家幾口人，可艱難啊！那會兒我進廠做工，她懷里抱着小的，手里拉扯着大的，給人家破草繩，紡毛綫，好歹混上口吃喝！我干一天，混不上一斤棒子面；她破一百斤草繩，才掙一塊“準備票”，你說，那還叫個錢？也不過為的捨點爛草繩，好有個燒的啊！

那一年，我大閨女就九歲了，她媽囑囑着叫孩子進廠，好幫我一把子。不是為了一家子糊口，誰忍心把這麼小的孩子往火坑里推呀！日本人說，當童工得十歲才合格。我和她媽就盼哪！盼哪！盼了太陽出，又盼星星落。誰承想，閨女這年9月里發開了瘧疾，瘧疾好了，又拉肚子，我們吃豆餅、雜合面，病孩子咽不下去，連餓帶病，瘦的小骨頭一根一根的，臉黃的像蠟渣兒，到臘月二十三，閨人家忙着過年，我那孩子折騰到後半夜，一口氣沒喘上來，合上了眼！

當爹當娘的，誰身上掉下來的肉不疼呢！她媽哭的死去活來，覺得對不住孩子啊！孩子開頭病的並不重，全是沒錢治給耽擱了的。可又怨恨誰呢？就這樣，死一個，哭一個，成天眼淚洗着臉過日子！她媽那眼，生生地哭干了，打那就坐了病。

指望閨女，閨女死了！工資還是那個數，物價卻像長上了翅膀，棒子面一斤就漲到兩塊四、五，哪有咱窮人的活路啊！那會兒大街上拉洋車的，跑着跑着，就摔在馬路上

爬不起来了！多少人都是扶着墙走道啊！

我在厂里实在受不了日本人的欺侮，跟日本工头干了一仗，就失业了。在旧社会，咱一个工人，你能耐天大，也跳不出人家的手心儿去啊！为了一天挣个块儿八角，称上点儿棒子面过活，没办法，天天下了班还得到人市上，去等着给日本鬼子去当“苦力”。唉！房漏偏遭连夜雨，大孩子刚死不过两年，我那五岁的小子叫江的，又出了麻疹。起初，孩子小脸挺红，脑瓜也有点热，可谁也没经心。大人的命还顾不过来哩，你经心又怎么着哇！我照旧天天去卖苦力；她妈怀里抱着江，领着八岁的静芬，从早到晚，给人家破草绳。咱住的那一带，街坊邻居，除了工人，就是泥瓦匠，摆地摊的，尽是一些穷人家，每年闹疹子死的孩子，噼噼啪啪像落枣儿似的。这回，俺那江也闹重了，脸上、身上起了一层红疙瘩，浑身滚烫，眼都封了。江他妈一慌，我也害怕了。

我那会儿就小四十子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同院的直劝：“他张大伯，孩子病得不轻哪！快找个大夫瞧瞧吧，拉扯大了，也是你们的指望啊！”我一想，也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到老来靠谁啊！其实，那会儿思想真糊涂，不打倒小日本和那些地主、官僚资本家们，即使把孩子拉扯大了，又能顶啥用呢！

江他妈不破草绳去了，我也不去卖苦力了。大医院咱住不起，只得抱着孩子找私人看看。人家一打量咱这破衣烂衫的，捏着鼻子，伸出俩指头，好歹给摸了摸脉，爱答

不理地說：“不碍事，买服‘回春丹’吃吃吧！”

一服“回春丹”就是五块钱哪！再說，現成的小药儿，哪能治什么病！

俺两口子守了孩子几天，他总算退了退热，緩上点来。几天不干活，再加上給孩子治病，家里紧得鍋都揭不开了！他媽抱着江滿处去借錢，錢沒借来孩子着了風，回来又发高烧！

孩子打得病那天起，就想碗面湯吃。豆餅、高粱粥都混不上哩，哪还敢吃白面！他媽怀里摟着孩子，摸着江的脑瓜儿說：

“好好着，江，病好了，等配給面下来，媽就給你做！”

孩子往媽怀里貼貼，睜开眼，点点头儿。但很快就醒过味儿来了，向他媽說：“媽，你淨誑我，領了面，你也舍不得叫我吃，你还卖哩！”

孩子的話，真叫人心里翻个子啊！虽說按月头配給几斤白面，为了保命，都是換成棉仁餅、杂合面来吃，大人孩子誰尝过个白面星儿！他媽貼貼孩子滾燙的臉，說：

“媽不騙你，这回領了面，不卖了……。”說是不卖，一家子怎么活呀！他媽的眼泪，順着孩子的臉往下流。

一家人光这么守着，也是个死啊！我只好把俩病孩子摺給他媽（大女孩靜芬也病了），还是去卖“苦力”。小江一病十八天，家里連被都变卖了。最后一个斗鍋卖了二十块钱，給孩子抓了服湯药，都沒个火熬。吃沒吃的，治又沒

錢，一耽擱，孩子的病又轉成了肺炎。

7月18号那天，我強把夜班支持下来，天明到家一看，閨女躺在床上直哼哼；她媽怀里摟着江，手里端着半碗開水，瞅着發喘的孩子，眼珠都直了；小江燒的迷迷糊糊，小鼻孔呼哧呼哧，有氣無力地叫着：“吃面湯……”我一看心都痛了。望了望賣得空空的四個存兒，除了炕上還有張涼席兒，剩下的賣也沒人要了。於是四只眼瞅着孩子，兩人輪換着隔一會兒叫一聲“江”。心下里想着但願孩子能挺過來。孩子昏迷中叫一聲“面湯”，我的心就像被撕扯下一塊……這樣挨到晚上八九點鐘，孩子忽然睜眼望了望我，嘴張了幾張：“面……”沒說完，小手一松，就搭拉下了腦袋。

當下，就像誰摘了我的心去，哭沒哭出來，一頭暈了過去。睜開眼時，窮鄰居們擠了一屋子。他們見我醒過來，因為夜已深了，才勸說着散去。

炕上一個病的，地下一個死的，深更半夜，我們兩口子哭都不敢出聲，守着孩子干掉淚。我忽然想起保長曾經通知，得肺炎死的孩子得馬上埋，不然惹下日本人來，就更倒霉！埋就埋吧！我扯下涼席把孩子裹上，他媽也不敢攔，我就趁着月亮地，奔了城外。

路上挺靜，沒碰見一個人影兒。我很快就來到了法政橋。一看到法政橋，心抽得更緊了！

如今，走哪條路，過哪座橋，還不能隨咱的便。早先那世道，法政橋可不是容易過去的，這倒不是河寬，也不

是水急，只是因为那里有警察，有宪兵！我可又一想，一个身无分文的臭工人，一个要飯赶不上門的穷光蛋，还有什么可怕的！正前思后想，前面桥头上吆喝开了：

“干什么的？站住！”跟着就是拉枪栓的声音。

一个警察过来了。我迎上說：“老总，孩子死了！我是去……”

“埋死孩子？他媽的，你哪害死的孩子？你上哪去？你他媽的別装蒜！”

这是哪儿的事呵！我不敢說旁的，强忍住气解释着：“老总，我是去埋死孩子的，今晚上刚死的。我就住在附近。不信，你可以过来看看。”

他凑上来捏了捏我夹着的席卷儿，“放下！站到一边！”抬起皮靴踢了踢孩子的脑袋，回头向我說：

“埋人，埋人得起照！你知道吗？”

一听这话，我赶紧陪着小心說：“老总，我扔个孩子，又不是发送、出殯……”

“混蛋！”警察拿枪口戳着我的胸口，“不管死嘛人，一律得起照！”

我看出来了，这哪是叫起照，分明是讹錢哪！我想，你算找錯主了，家里連鍋都卖了，你还想从干骨头里榨出油来？可当时嘴上还得哀求他，他松了口說：“沒多，还没少？”

我看看自己混身上下，窟窿套窟窿的背心，褲衩腿破得像两把破蒲扇，甭說錢，連盛錢的地方也沒有啊！我抬

起脚，让他看磨飞了的鞋。

“混蛋！奶奶个×！誰管你穷富，沒錢去借！”他把伸开的巴掌冲我翻了一翻，說，“頂少鬧这么个数！”

啊！十块！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当初要有十块钱，我那江还死不了呢！想到这儿，我胆子也壮了，一边抱起孩子，一边說：

“孩子我不埋了！这該行吧，老总？”

“我看你成心搗蛋，今天是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
……。

我蹲在河堤上，守着亲骨肉，哭都哭不出声来呀！往那边漫荒野地望望，黑漆漆的，心里就想：“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

这些事，新社会长起来的年輕人，兴許都不信！在那黑暗的社会里，骑着咱穷人脖子拉屎的事，还数得清啊！后来怎么过的桥？咳！我是豁着破罐破摔了，那警察看实在从我身上捞不着什么，才拳打脚踢地把我放过去了！

这些伤心事，两車皮也載不完哪！日本侵略者的可恶，就甭提了！把“刮民党”“遭殃軍”盼来了，誰知他們跟日本鬼子是一路货！我后来又有过两个孩子，一个三岁的閨女，一个两岁的小子，也都这么活生生地煎熬死了！

总算是盼到了解放，我的好日子开始了；可我觉得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得好好干啊！要不然就对不起党和毛主席。我老伴也是这个心思。如今俺家三口人，爷儿俩的工資不算少，可我那老伴不許枉花一个。头些年买公債，

这些年儲蓄，都是跑在前头。为这，区上还奖励过她“紅勤巧儉”奖状。

我是1958年入的党，老了老了，心里更亮堂了！俺老伴呢，那眼是汪死了哭瞎的，一直摸了十几年黑儿。如今医治的，瞧，切菜、做飯，也能照样干！她逢人就說：

“年輕工夫把眼瞎了，如今到眼花的年紀，倒豁亮起来了！”

你听听，要不我常跟她說：“过吧，一直过到共产主义！在新社会里，咱是越活越年輕啊！”

（楊金錫、肖 渺 整理）

我家的三件“宝”

合成橡胶厂工人 曹桂凤

我家有三件“宝”，一件是补钉罗补钉的蓝格粗布被，另外两件是一大一小的两只讨饭篮子。破棉被是我爷爷当长工时盖的，爷爷死后交给了爸爸，妈妈又用它偎大了我们。两只讨饭篮子，是妈妈和我在解放前讨饭、挖野菜时用的；那只大篮子，一直跟了妈妈半辈子。小篮子，是妈妈从地主家的粪土堆里捡来的，跟妈妈要饭时，我就挎着它。那时，我十来岁，整天跟着妈妈从南街到北街，从东庄到西庄，风里雨里向人乞讨。

这三件“宝”，渗透着我们家几辈的血和泪，是妈妈特意保存下来的。她让我们把破被仍然放在床头，两只篮子也挂在屋里显眼的地方，出来进去都能看得见。每当讲起这三件“宝”的来历，我们就想起了解放前身受的阶级苦，对地主、资本家切齿憎恨。

家破人亡

我家是河北省冀县人，爷爷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只留下那么一条破棉被和一间土房，欠债倒有一屁股。爷

爹临死时，气愤地对爸爸說：“老財不是人吶，压得我直不起腰来。你有志气可別再給他們当牛馬呀！”爸爸一心不想当长工，可是，村里村外四面八方的庄稼地都是地主、富农們的，沒有穷人立脚的地方，不当长工沒有活路，一来二去，爸爸还是当了长工。老財繼續騎在我們的脖子上。爸爸起早摸黑，披星星戴月亮地干活儿，也养活不了一家大小。我們娘儿几个只好靠討飯、挖野菜过活。有一年鬧荒，我和媽媽連飯也討不来了，不能眼看着一家大小活活地餓死呀！媽媽一狠心，就給怀抱的小妹妹断了奶，給地主当奶媽子去了。媽媽給地主羔子喂奶，心里像刀絞，因为这喂的不是奶，是妹妹的肉啊！小妹妹才三四个月，吃不上母亲的奶，又吃不上別的东西，不久，就活活地餓死了。我的五妹妹死的更惨。五妹咽气前，还喊着：“餓餓，餓餓……”我听着心焦，跑到野地里拣了把山芋蔓，砸了砸，糊了两个餅子。这时，媽媽回来了，当媽媽接过松散的餅子，托着送到妹妹眼前的时候，誰知，妹妹已經断了气。媽媽抱起皮包骨的小尸体，哭得死去活来，她着魔似地說：“孩子，是媽‘害’了你的命呀！”

更大的苦还在后头。爸爸給地主干活，冬天連双棉鞋也穿不上，他的脚都冻烂了，也不許歇会儿，稍一停歇，地主的狗腿子就大嚷大叫：“他媽的，一天价吃着老爷的飯，你还偷懶？”爸爸是个耿直的人，有一回，他实在气憤极了，就反問狗腿子說：“老爷的飯是哪儿来的？还不是穷哥儿們的血汗换来的？”这句话，問得狗腿子目瞪口呆，

无言对答，他恼羞成怒地像条疯狗，猛地扑了上来，拳打脚踢，还用皮鞭子抽，打得爸爸顺嘴冒血。爸爸连气带伤地，回家后就一病不起了。平时我们就混不饱肚子，现在更没有钱请医生抓药，爸爸熬了二十多天，就怀恨死去了。

淪落天津

地主的心是黑的，地主是黑心狼。爸爸死后，地主下话不准街坊邻居来帮忙。多亏和爸爸一起当长工的伙计们，他们瞒着地主和狗腿子，把爸爸埋了。我们埋完爸爸刚回来，地主就踹门进来，逼着妈妈还债。他硬说爸爸在世时，借了他家几合谷子，如今已经息滚息，利滚利地滚成几斗了。眼下，全家连口吃的都没有，哪还能还债呀！妈妈求他们再宽容几天，狠心的地主说什么也不答应。邻居们和我家一样穷，谁也帮不了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摆在妈妈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寻死，一条是卖孩子顶债。死，妈妈怎能忍心？我们刚刚死了爹呀！怎能再让我们死了娘？邻居们说，这是阎王债，不如把孩子卖出去，或许还能活条命。卖儿卖女就像割妈妈身上的肉，妈妈搂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决定把我送到天津一个亲戚家另找活路。那时，我已经十七岁了，临走那天，妈妈强忍着泪对我说：“孩子，逃命去吧，别怪妈妈的心狠。你走以后，妈和你妹妹还不知要走到哪里。记住，这都是老财逼得咱家破人亡啊！”

从此，我就来到了天津。经人介绍，我给资本家当了

丫头，背煤、送水、烧烟泡什么都干，还是过着受压迫、受凌辱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和媽媽也断了联系。

骨肉团聚

天亮了，天津解放，我才有了出头之日。政府把我介绍到合成橡胶厂当了工人。翻身后的日子好快乐，一晃好几年就过去了，媽媽怎样了呢？后来看到报纸上登了不少起母子重逢、夫妻团聚的事情，我也非常想念媽媽。有一天，我凭解放后学的一点文化，给家乡写了封信，打听媽的下落。媽媽沒有名字，信封上只好写“曹赵氏”，这样的信不好寄到，所以能不能找到媽媽，我心里沒有一点儿底。誰知，我媽媽还真从苦水里挣扎出来了。1954年的一天，一个女孩子領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走进我家院里。起初，我还以为是她们走错了門，或是問路的，等到听老太太說要找曹桂凤，我才心里一动；可又想，我媽媽不瞎呀？我媽媽是骨瘦如柴，哪有这么胖啊！我扶着老太太进了屋，一面仔細地端詳着她。进了屋，还是老太太先开了口，問我曹桂凤是不是住在这里，我說：是。接着她就說起我的身世来，爸怎么死的，地主怎样逼債，又怎么送我来天津……这都說的是我家的遭遇啊！她们准是我媽媽和我妹妹。真想不到她们还活着！我心里真是又难过又高兴。不由自主地扑到老太太怀里說：“娘，我就是桂凤啊！”我們母女三人抱头痛哭。媽媽摸着我的头，掐我的肉，顫着声說：“桂凤，别难过。要不是他老人家和共产党

党，咱哪有今几个呀！”我知道，她說的老人家就指的是毛主席呀！

重見光明

我媽的眼是哭瞎的。自从地主逼得媽媽把我送到天津以后，地主的債仍旧还不上，媽媽又挨了地主一頓毒打。后来，媽媽租种了別人几分地，可是又被日本鬼子挖了护村沟，媽媽只得拉着妹妹到处流浪，討飯过活。媽媽孤单单，想起一家的遭遇就哭，一来二去就哭瞎了眼睛。

厂里領導上和伙伴們听說我們母女团聚，都高兴的不得了，还劝我給媽治眼。由于現在工人有了劳保福利，家屬看病也只花一半錢。經過中医、西医的治疗，几个月的工夫，媽媽又重新見了光明。这时，媽又說：“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一輩子也見不到日头了。”

永不忘本

一家骨肉团聚以后，使我进一步体会到翻身的快乐，同时，也感到作为一个工人，肩头上的担子很重。党告訴我天下穷人是一家，过去的遭遇，不是我一家一户的，是整个階級的遭遇；今天，我們好了，可世界上还有多少工人、农民过着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我們不能只顾自己。明白了这些，我要求入党的心情更迫切了。1956年2月，党接受了我的申請，批准我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黨員。我向党表示，决心为党的事业、为世界受苦人的解放奋斗到

底。媽知道我入黨了，也高興得睡不着覺。這年，她還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把破被子和兩只討飯籃子找着給我拿來了。媽媽說：“媽沒有給你們留下什麼，這就是咱的‘傳家寶’，看見它，就會記住過去的苦。”我明白了媽媽的用意，是叫我們永不忘本啊！

媽媽來了以後，我們娘兒兩個就常叙說家里過去的苦。每叙一次自己的家譜，讲讲“傳家寶”，對自己都有挺大的幫助，使我对旧社会更加憎恨，也更热爱今天。加上党的教育，总想在生产上多出把力气，干起活来，就和从前不一样了。原来干活只知道自己使劲儿干，目的是报答党的恩情，打这，我觉得光是把自己那摊活儿干好还是不够的，凡是对党、对国家有利的事都应该干。看到别人机台旁掉了碎胶皮，我心疼；有的青年没等下班就去洗手，我觉得这样不好，也常说几句。有的青年不大理解这点，说我“管得宽”，我说：“今天的幸福日子来得不容易，不管哪行？”

經常叙家譜，讲“傳家寶”，不只提高了自己的覺悟，也教育了我們家的青年人。1961年，大家選我當了市勞動模範。一天，我从市里开会回来，妹妹看我还是穿的那双布鞋，就自作主张，跑出去买来一双新皮鞋。她說：“當了模範啦，還不讲究讲究，穿皮鞋多大方？”媽媽在一旁看見了，不高興地說：“世喜，你想歪了，咱是窮人家的底兒，可不興這樣！”我也告訴她為什麼不能忘記過去，不應該過分注意吃穿。打這以後，妹妹自己才比較注意儉朴



了，在参加农业生产以后，表现也比较好。1962年，妹妹所在的生产队收成不错，社员生活提高，妹妹手里也攒了些钱，到市里来想买这又想买那。我想，妹妹毕竟年轻，懂的事情少，小时受了些苦，日子久了，怕也忘了。我就和妈妈商量，该给妹妹讲清三件“宝”的来历。我们把一家人在旧社会受苦的經歷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可不是，没出我们的预料，妹妹脑子里的糊涂想法可不少。

“你不会不伺候地主吗？”妹妹在听到妈妈不得已给地主当奶妈的时候竟这样问。

“你爹死后，我就铁了心，拉着你姐俩讨饭，也不给地主当佣人，地主不是照样找上门来逼债吗？”妈妈说。

“那怎么不躲开他们？要躲开不就好了吗？”

“躲开这群狼又能怎么样？在天津还不是照样受资本家的气？天下老鸹都一样黑呀！”我说。

这次我们对妹妹的教育不小，没等我们说什么，她自觉地把钱收起来了，派了正当用途。

通过这件事，对我启发也很大，年轻人是喝甜水长大的，不知天高地厚，应当对他们讲讲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的剥削压迫。

我家的三件“宝”是使我们永不忘本的活教材，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正像党嘱咐的，我们一定把它好好地保存下来，让“传家宝”代代相传。

（石德连 整理）